

中文摘要

香港是基督新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后勤基地和集散地之一。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及其信徒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客观上为近代香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对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其社会影响予以初步分析研究。

根据基督新教在香港传播与发展的特点，可将其历史分三个时期：西方差会时期，传教士多以香港为进入中国的跳板和桥头堡，并没有立足本地华人传教，创立的少数华人教会也处于尝试性阶段。华人教会时期，华人教会开始摆脱对西方差会的依附，走向独立、自主，并开始走向联合。困难与复兴时期，日本占领香港期间，教会领袖和信徒大批离港，新教发展受挫。战后信徒陆续返港，教会得以复兴。

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既有全中国范围内的共性，也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中国大陆相比，教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社会基础相对广泛以及信徒群体社会阶层较高，这些都是基督新教在香港传播的独特之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和发展，必然会对近代香港乃至中国产生一定社会影响。教会及其信徒出于宗教目的而开展的大量教育活动，客观上推动了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新教传教士采取各种文化手段辅助传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此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人物，或因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或因与驻港传教士往来密切，其思想发展受基督新教的影响较大。

综观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可以发现，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香港并非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中心城市，也非西方传教士刻意经营的传教点，而只是其藉以进入中国的“踏脚石”和躲避灾难的“避难所”。但近代香港的发展与基督新教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基督新教在香港积极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具有开创性意义，客观上推动了近代香港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关键词 基督新教；教会学校；文化交流

ABSTRACT

Hong Kong is the base and spreading center of the promulgation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To promote their religious, the churches and their disciples in Hong Kong launched a chai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growth of the city. This paper aims at summing up the spreading of Protestantism in Hong Kong in modern ages and explaining its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in general.

The promulgation of Protestantism in Hong Ko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western church, most western missionaries just took Hong Kong as a touchstone, never making much efforts on settling down and serving the local citizens, and the few churches by Chinese are only experimental.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church, churchmen began to get rid of the yoke of western church and began to seek independence and union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e difficult and renaissance period, Protestantism suffered a setback with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many church leaders and religious disciples just fled this distressed land. The Chinese churches revived onl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promulgation of Protestantism in Hong Kong possess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nationwid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the island. Compared with mainland, churches in Hong Kong enjoy a close tie with the government, an extensive social basis and a Christian colony with a higher social position, which jointly make it a unique phenomenon.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ism influenced the Hong Kong and even the mainland in modern ages. Out of religious purposes, many educational facilities were established which promoted the educational growth of the city.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employed various cultural means to assist doctrinal teaching which, to a greater extent or less, enhance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Mr. Sun Zhongshan, a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precursors, had his revolutionary ideology rooted in protestant beliefs which may be traced back to his early education received in Hong Kong or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riests.

After close examin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Hong Kong is not a center or a made center of the teaching of protestant beliefs, but a stepping stone or harbor, on the part of western priests, to shelter themselves from the modern warfare or to penetrate into the mainland. But it di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activa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Protestantism, mission school, cultural exchange

广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夏玲

日期：2005年5月10日

广州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授权广州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广州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夏玲

日期：2005年5月10日

导师签名：何月田

日期：2005年6月2日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意义

区域研究是史学研究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更是着力探求区域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等课题，从而了解区域的变迁、社会演进的因果，以及对全国发展的影响，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香港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也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尤其是自 1842 年被割让给英国至 1997 年回归，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程，使香港成为了一个华洋荟萃、中西交融的区域。近代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既非完全同于宗主国，也非全异于中国，而是独成体系。因此，开展香港区域史的研究，深入、透彻了解香港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利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相互理解、沟通，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

近代香港的发展与基督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清政府禁教政策尚未解除以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难以展开传教事业，所以在鸦片战争后大批涌入新辟为殖民地的香港；清廷开禁后，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有利的地理位置，香港仍被传教士视为向中国推广基督新教的后勤基地和集散地。由海外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多驻足香港学习汉语，在体认中国文化和国情后转赴内地传教；内地教会人士也多因疾病或战乱而退居香港。为推广福音，教会及信徒除在港从事翻译、出版圣经等福音书籍的工作外，还著书办报、创设学校和医院、兴设慈善机构，源源不断地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体制等输入香港及中国内地。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进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了香港的现代化进程。

香港是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桥头堡和集散地。教会及其信徒所创办的各种事业、所倡导参与的各种社会运动，对香港乃至全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如传教士创设的教会学校开香港近代西式教育之先河，对近代香港的教育影响很大，培养了大批的先进人才，推动了香港教育体制和体系的形成、完善；教会人士创办的报刊、著译事业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为香港华人办报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推动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教会人士本着“社会关怀”的精神，倡导和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香港的社会风气，推动了中国社会革新运动的发展。

对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近几年，香港方面出版了一些研究该课题的专著，也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但多系香港教会人士为之，难免有夸大、拔高之嫌。香港回归后，国内学术界对香港区域史的研究有所增

加,但除个别专著、文章对香港的基督新教的现况稍有涉及外,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真空。因此,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1.2 学术回顾

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可上溯到民初谢洪赉的《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陈金鏞的《中国布道史》^[1]、1940年协和大学王治心教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2]。由于种种非学术因素,自解放至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几乎未出版过较系统的相关著作。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3]填补了空白,但此书仍未超出“文化侵略”评价模式。1986年他又出版了《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4],该书本着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剖析的原则,对二十多名著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活动作了广泛而比较科学的论述。1985年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也涉及到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九十年代后,学术界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专著,较为突出的有: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6],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现代化》^[7]、吴义雄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8]等。港台方面,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著作主要有: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9]、林治平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文化论文集》^[10]、查时杰主编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11]、汤清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12]、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13]等。这些论著都有涉及到传教士在香港的活动,能给本课题以有益的方法指导和启示。

有关香港基督新教的研究,大陆方面专著和论文都比较少。1996年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14]一书,专门将香港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独立成章,但较粗略,未深入细致探讨。另外,一些有关香港的报业、教育发展等方面的著作稍有涉及到教会在香港的兴

^[1] 目前笔者尚未找到此两种书的版本。

^[2]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四版。

^[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 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10]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文化论文集》,香港宇宙光出版社,1970年版。

^[11] 查时杰主编:《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12]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

^[13]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一、二、三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1993、1997年版。

^[14] 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学、办报、出版等活动及其影响。如陈昌凤的《香港报业纵横》^[1]等。论文方面，笔者目前找到的论文仅有雷雨田的《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2]一文，主要从传教士在香港开展的教育活动和著译出版工作两方面论述了香港传教士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香港方面，主要是教会人士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1941年刘粤声出版了《香港基督教会史》^[3]，该书分为会宗史略、堂会史略、联合事业、慈善事业、社会事业和个人传记等七个专题，对香港的基督新教传播史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李志刚博士对香港基督教有较深入研究，他出版的《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4]收录了九篇相关香港基督教的文章；《香港教会掌故》^[5]一书虽是基督教方面的通俗读物，但富含有十分有价值的史料。另外，梁家麟的《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和《华人宣道会百年史》^[6]等都有涉及到香港基督新教的活动及影响。另外，香港各宗会、堂会出版的一系列的有关本宗会、本会堂的史略和纪念特刊等都是研究香港基督新教的重要资料。

1.3 研究难点

研究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个较有难度的课题。个中原因，除基督新教是一种复杂且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外，我觉得还有如下困难：1) 相关资料多集中在香港地区，且十分散乱，不易收集；2) 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数是教会人士所为，难免有拔高、夸大或隐实之处，要从中甄别，有一定难度；3) 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但学力所限，对此学科缺乏深入理解。尽管如此，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

1.4 资料来源

由于香港在近代的特殊政治历程，国内留存的有关香港基督新教的资料较少且分布十分散乱。本文采用的资料部分收藏于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中山文献馆以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等处的港澳台部，部分资料是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的

[1]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 雷雨田：《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载《广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3]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41年版。

[4]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

[5] 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6] 梁家麟：《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3年版；《华人宣道会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版。

相关著作以及香港各教会的周年纪念期刊。主要资料如下：

余伟雄主编的《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基督教香港崇真会 1987 年编印；《香港崇真会救恩堂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特刊》，基督教香港崇真会救恩堂，1977；《香港公理堂五十周年纪念刊》，香港公理堂，1934 等教会周年纪念特刊。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藏书。

徐松石编著的《华人浸信会史录》第一辑和第二辑，香港浸信会出版部 1972 年出版。广东省基督教协会图书室收藏有此书。

刘粤声的《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出版部出版，此书最早于 1940 年出版，本文采用的是 1997 年的增订本。广州市图书馆港澳台部藏书。

麦梦生编著的《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 1933 年出版。此书编辑了反对蓄婢运动的大量原始资料，中山文献馆藏书。

Anthony Sweeting（安东尼·史域）：*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藏书。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外国传教士于 1832 年至 1851 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期刊。该刊自 1841 年后登载有论及香港教会的文章。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完整的影印本。

此外，一些相关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著作如吴义雄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等，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

第二章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概况

2.1 传入背景

基督新教在 19 世纪中叶传入香港并获得传播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和天主教的不友好态度，使得新教在中国境内无法展开传教活动。新教传教士选择了毗邻中国的马六甲作为向中国传播宗教的据点，同时，他们也努力地在中国本土寻找合适的传播基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的愿望得以实现，香港被割让为英殖民地后，一批传教士迁港，基督新教由澳门传入香港。

2.1.1 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天主教的不友好态度

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可上溯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因“礼仪之争”，康熙帝以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 但康熙朝并没有十分严格地执行禁教政策。

雍正三年（1724），清政府颁布禁令：“着国人信教者应放弃，否则处极刑；各省西教士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2] 开始严格地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乾隆帝则分别于 1736 年、1737 年、1746 年进行了三次迫教行动。嘉庆帝更加严厉的查禁天主教，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如“西洋人私刻书籍，即行查出销毁”^[3]。嘉庆十七年（1812）清政府再次颁谕：“自此以后，如有西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西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从军远方。”^[4]

尽管上述政策针对的是天主教而非基督新教，但对清廷来说，二者都是“洋教”，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禁教政策同样适用于基督新教。

新教还面临来自天主教的阻碍。天主教传教士并未因禁教而停止活动，而是转入地下秘密传教。据《中国丛报》记载，1810 年，共有 31 名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 16 个省进行非法秘密传教活动，全国天主教徒约 20.5 万人。^[5] 这意味着新教入华时天主教已具备一定的

^[1] 转引自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版，第 26 页。

^[2] 转引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 年版，第 254 页。

^[3] [清]王之春撰：《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 149 页。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四版。

^[5]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444.

势力。时值清政府禁教和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外来宗教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为争夺信徒和传教空间，天主教对后来的新教颇不友好。如新教传教士米怜为协助马礼逊工作而抵达澳门，但在天主教传教士策动下，葡萄牙当局令其离境。尽管马礼逊曾为此事奔波，但仍无济于事，米怜只好迁往广州，在清政府的严密监视下，过着十分不安的生活。^[1]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大多有过类似遭遇。

清廷的严厉禁教和天主教的敌视，使基督新教在中国境内难以获得较快发展。

2.1.2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17—18 世纪，西方兴起“福音奋兴运动”宗教改革热潮，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由此产生。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以向海外传播宗教为目的的新教传教团体纷纷派遣传教士到海外非基督教民族中开展宣教活动。人口众多的古老中国是传教士们首选的“拯救”目标。

1807 年 9 月马礼逊抵达广州，被视为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他来华的直接任务是学习中文、编辑英汉辞典及翻译《圣经》，而非“传道与说教”^[2]。但在完成差会任务的同时，他并未放弃宣教事业。在无法合法布道的情况下，马礼逊靠办学校、施医赠药等手段辅助传教，开创了文字传道、教育传道、医药传道等传教方式，对后来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方针有倡导之功。另外，他出版的《华英字典》、各类书刊及选译的中文新约圣经等，对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继马礼逊后，米怜等传教士陆续来华。据统计，1842 年前英美基督新教派遣赴华的教士就达 61 人之多。^[3] 尽管中国政府严厉禁教，但传教士通过教育、医药等辅助手段传教，使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传教方面，以澳门、广州、南洋为主要传教区域，个别传教士如郭士立到达沿海省份，接收了第一批为数不多的华人教徒，创建了对华传播基地—马六甲；教育方面，传教士创办了英华书院、马礼逊纪念学校等，组织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出版方面，据伟烈亚力记载，1842 年前澳门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籍及小册子合计达 115 种，^[4] 传教士还创办了一批中英文定期刊物，开中国报业先河；医药方面，首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新豆栏开设的眼科医局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取得一定成就，开创了文化传教方针，为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1]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 124.

^[2] 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223.

^[4]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第 13 页。

2.1.3 鸦片战争与基督新教传入香港

1840年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对华侵略战争，并于次年1月16日占领香港岛，1842年8月正式割占香港。这场战争及战后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外关系新的转折，对基督新教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宏观上看，五口通商必然使居留在此的外国人提出信奉宗教的权利，传教士在五口城市得以合法传教。具体对香港而言，早在英军占领港岛13天后，八名传教士便组成小组到香港探索传教前景，得出“（香港）可以形成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1]的结果。《南京条约》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宰，任便立法治理。”^[2]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随后，大批奉行新教的英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入港，原先在澳门、东南亚等地布道、办学的传教士相继登陆港岛。另外，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新教在港岛获得自由发展之机。

鸦片战争后，以“中华归主”为己任的新教传教士陆续迁港，基督新教得以传入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治环境，使新教传教士逐渐在香港建立传教据点，使之成为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的后勤基地和进入内地的桥头堡。

2.2 传播概况

基督新教传入香港始于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进入香港的基督新教传教士是由澳门迁港的美国浸信会的叔末士夫妇和罗孝全。之后，一批久寓澳门的传教士迁入香港，随之迁入的各种事业对新教在香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1911年，已有9大公会传入香港，1941年增至14个。新教在香港先后建立了近100个基督教会，传教区域则随香港界域的拓宽而扩展至新界、九龙一带。

根据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发展的特点，可将其历史分为西方差会、华人教会、困难与复兴三个时期。

2.2.1 西方差会时期（1842—1883）

这一时期是基督新教在香港的初创阶段。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的旧有差会和战后进入中国的差会均向香港派遣传教士，设立传教站。该时期进入香港的西方差会主要有：美国浸信会、美国公理会、伦敦传道会、崇真会、礼贤会、信义会、安立间会、循道会等，分属

^[1] 施其乐：《香港最早期的传教士情况》，载《景风》第19卷，第3—4期，1976年，第26—28页。

^[2] 王铁涯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9月版，第31页。

于公理宗、信义宗、圣公宗、浸信宗、循道宗五大宗派。

美国浸信会是最早入港的差会。1842年1月，该会传教士罗孝全迁至香港。3月叔未士夫妇随至，并在上环百步梯设“宏艺书塾”，从事教学传道。这所“宏艺书塾”，虽名为“书塾”，其实并非一个普通教学授课的地方，只是一所传播基督教义的讲堂罢了。^[1]7月，叔、罗两位传教士合作在中环设立香港第一间基督新教礼拜堂——“皇后大道浸信会”(The Queen's Road Chapel)。此教会虽主要向英军工作，但开启了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里程。同年10月，蒯为仁(又译威廉·迪恩)至港，并于次年5月成立专门以潮籍居民为对象的“香港潮州教会”(Hong Kong Tie Chiu Church)，并自任教会的牧师。^[2]不久，叔未士建立浸信会香港传道团，除在香港岛传教外，还于附近的九龙半岛的中国居民村落如长洲、昂船洲等地活动。随着清廷对教禁的解除，该会将传教事业移往广州，浸信会在港工作于1844年遂告停顿。1860年荷兰国教士约翰夫妇来港，先借伦敦会聚会所开展活动，后于中环百步梯购洋楼为宣道所，因见在港发展机会不佳，乃于1865年转入潮州开基。1880年约翰夫人复来港，在荷里活道创设女校，请陈时珍教书兼传道，逢主日则借伦敦教会堂礼拜。^[3]

美国公理会：又名纲纪慎会。1842年7月，该会传教士裨治文前往香港，“开始修建一个教会所，同时监管马礼逊教育会和中国医药传道会房舍的修建”^[4]。次年，另一名传教士波乃耶离开澳门到香港定居，并协助裨治文从事传教活动及中文印刷出版业务，设立香港传教站。同年7月，美部会中国传道团会议在香港召开，来华的美部会成员如雅裨理、伯驾、卫三畏等都参加了会议。考虑到大陆口岸更广阔的发展机会，1845年裨、波两牧均迁入广州。受旅美华侨之请，1883年美部会再次派喜嘉理抵达香港，于必列者士街开设礼拜堂(中华基督教公理会的前身)，开始在港岛华人中宣道。传教初期教务工作进展缓慢，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明显影响。如中国早期社会革命的佼佼者宋毓林、陆中桂(浩东)、唐雄、孙中山(受洗名为孙日新)等，均为初期接收的信徒。^[5]

伦敦传道会：早在中英签订《川鼻草约》后，该会职员洛克、合信和马礼逊之子约翰便因职务之需迁入香港，是最早进入港岛的新教人士。1843年11月，理雅各将伦敦传道会设在马六甲的总部和英华书院迁入香港。因训练华人传道人员的需要，英华书院被改为神学院，且伦敦会多以书院为集会、施行洗礼之所，所以俗称英华书院公会。不久，该会

[1] 徐松石编：《华人浸信会史录》，第二辑(港澳地区)，浸信会出版部印行，1972年1月版。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440.

[3] 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2月版，第250页。

[4]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2-143页。

[5]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第6页。

先后在上环皇后大道、湾仔道设立真神堂和福音堂，奠定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的基础。1852年湛约翰抵港主理教会。由于会务日渐发展，华人信徒不断增加，华人教会乃借理雅各主理的香港愉宁堂聚会。

崇真会：原名巴色会。为响应郭士立多派教士至香港和广东的号召，韩山文和黎力基于1847年抵港。韩、黎两牧本着巴色会“以香港为进取退守之据点，谋发展内陆之传道计划”^[1]的宗旨，分别在港习成客语和潮语后，便深入东莞、归善、宝安和潮州等地开展工作，后因无法在内地立足才返回香港。1851年韩山文在大道中掘断龙建成宣道所，开幕之日到会的有客族男女60人次，^[2]开香港客族教会之端，但不久即转往宝安活动。1854年黎力基接任病故的韩山文牧师的职务后，开始拓展香港崇真会的工作。巴色会专以客族为传教对象，太平天国起义后，内地客族因逃避战乱而大批入港，在肖箕湾、西营盘一带定居，故在两地先后于1862年和1864年设立崇真堂。

礼贤会：原名巴冕会。1847年德国巴冕会派叶纳清和柯士德与巴色会的韩、黎同船抵港，是较早入港的差会之一。但该会“非欲立教会于本港”^[3]，初期主要在广东西部进行活动。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批进入内地的外国商人、传教士为躲避战乱移居香港，礼贤会才于西营盘购买楼座，以供牧师和信徒驻足。但随战事渐趋平稳，该会传教士又多迁入内地。

圣公会：即英国安立间会。1843年史丹顿最先抵港着手开办教会，次年史密夫来港接任其职，创立英人教会圣约翰堂，开办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并开始筹办华人教会。1863年该会封立罗心源为会吏，专门负责华人教会的工作，但华人信徒仍附属于西方人的教堂内。圣公会在港兼办神学及飞利学校，培养教会人才，为日后派立华人主持教会打下基础。

另外，循道会（即惠斯理会），信义会（巴陵会）也曾派遣传教士来港工作，但多转往沿海城市，没有在香港设立教会。

除各差会外，“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也是这一时期活跃的新教组织。本着“以华传华”的宗旨，郭士立于1844年2月在香港正式创立“福汉会”，意欲“汉人信道得福”^[4]，目的是使华人在中国对中国人传播福音，外国传教士主要从事教导工作。福汉会并非传统的教会，而是一个信徒训练中心。^[5]该会活动主要采用教导与实践并重的方式进行：先教入会华人基本教理并派遣至附近乡镇派发宗教书籍，继而教授较深宗教理论后派往各

[1] 《香港崇真会教恩堂建堂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特刊》，基督教香港崇真会教恩堂建堂，1977年，第48页。

[2] 余伟雄主编：《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印，1987年，第60页。

[3] 罗彦彬汇集：《礼贤会在华传教史》（1847—1947），礼贤会香港区会印行，1968年5月版，第4页。

[4] 王元深：《圣道东来考》，香港道声出版社，1907版，第13页。

[5]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64页。

地传道。据该会早期人员王元深记载，先后有受洗华人李清标、王元深、蔡福、亚爱、徐道生等借入港的西方传教士入内地传教，^[1] 为中国内地传教的先声。福汉会是当时中国最具规模的传教组织，发展很快。该会创办时仅有会员 21 人，除郭士立、罗孝全外，其余都是华人。1845 年增至 80 人，1846 年 6 月受洗人数 179 人，1846 年 3 月有会员 300 人，传道 50 人，1847 年底洗礼人数 900 人，50 人为发书员，传道有 80 至 90 人，1848 年 5 月会友共 1300 人（发书员 100 人），其中传道人及助理有 112 人。^[2] 该组织也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先声，虽以香港为训练中心，但其活动范围远至海南岛、广西、福建、山东、北京、山西等内陆城市，其训练的华人信徒成为中国早期华人教士的重要组成部分。1851 年郭士立病逝，福汉会由那文勉强维持至 1855 年结束。

就全国范围内而言，这一时期香港基督新教的发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43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4 日，伦敦会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在华首次译经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伦敦会传教士外，还有美部会、美国浸信会、马礼逊教育协会、美国长老会等差会代表，分别来自马六甲、新加坡、雅加达、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会议统一了圣经中的一些译名，并设立一总委会从事中文圣经翻译工作，这就结束了来华传教士个人译经的历史，在华译经事业渐趋组织化。碍于海禁和地域限制，早期来华教士多是各自为政，并无统一传教对策。此次会议虽以译经为主题，但以译经为中心，规划了各差会在中国的传教计划，故会议实为各差会来华传教士的首次宣道会议，突显了香港在传教史中的特殊地位。

可见，香港虽有自由传教的优势，并一度成为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的活动中心，但并非来华传教士的首选目的地。入港传教士多把香港作为入华的跳板和传教人员的培训基地，在了解中国国情和掌握中国语言之后，很快转赴内地工作。随着弛禁政策的宣布，传教中心逐渐北移。这一阶段，新教各差会各自为政，但都比较注重开展教育活动来吸收华人信徒和培养华人教士。依靠各种手段，基督新教在香港获得初步发展，各差会争相在港设立教会达 13 所。但华人基督徒经常在西方人的教堂里聚会，华人教会多由西教士掌管，华人教士极少且多派往内地工作。

这一时期，香港教会的开设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格空白处为不详）：

^[1] 王元深：《圣道东来考》，香港道声出版社，1907 年版，第 16 页。

^[2] 余余伟雄主编：《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印，1987 年，第 66 页。

表 2-1 西方差会时期的教会开设年表

Table 2-1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rches during the period of western church

堂 名	开设年份	所属教会	创办者	备注
皇后道浸信会	1842	浸信会	叔未士牧师	
街市浸信会	1843	浸信会	罗孝全牧师	
香港愉宁堂	1845	伦敦会	Rev.Legge	
西人圣约翰堂	1849	圣公会	史丹顿牧师	俗称大礼拜堂
长洲浸信会	1860	浸信会	葬为仁牧师	
筲箕湾崇真堂	1862	崇真会	黎力基等	1941年自立
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香港堂	1862	中华基督教会	理雅各牧师	前为真神堂
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	1863	中华基督教会	理雅各等	前为福音堂
西人联合教堂	1865	联合教会		前为愉宁堂
圣士提反堂	1865	圣公会	施美夫主教	1927年自立
崇真会救恩堂		崇真会	黎力基牧师	前为客家礼拜堂
圣彼得堂	1871	圣公会		
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	1883	公理会	喜嘉理、温清溪	前为美华自理会

2.2.2 华人教会时期（1884—1940）

19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基督新教的教会完全掌控在西方传教士手中，并未建立华人自理教会。1884年圣公会按立邝日修为首任华人牧师，开启了香港华人教会的历史。此后，华人信徒纷纷组建教会，并逐步实现自立、自理。至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人教会基本上实现自理。与此同时，香港基督新教各派开始结束各自为政的局面，组织成立各种基督教团体，开展联合活动。

由于转口贸易和航运业的勃兴，香港经济日渐成长。而国内战难频繁、政局不安，华南地区的人口及财富逐渐南移。1880年代前后，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的城市。^[1]另外，早期入教会学校就读的华人逐渐成长为知识分子。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知识的增长使华

^[1]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7月版，第285—286页。

人信徒的民族意识普遍提高，深感创建华人自理教会的必要。1884年3月9日，圣公会派立邝日修为牧师专门负责主持华人教会，而以西方传教士为辅助。^[1]邝日修是西方差会在香港按立的首任华人牧师，这标志着西方差会权利的转移和华人教会自理的开始。

道济会堂（即今日香港合一堂的前身）是香港第一所由华人主动组织堂会、筹款兴建教堂、招聘主任牧师的自理教会。伦敦传道会的早期华人信徒或于英华书院内聚会，或借西人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到1880年该差会华人会友增至二百余人，教会中的华人知识分子，如黄胜、何启、邝日修、温清溪等人认识到独立华人教会的重要性，开始进行筹款等工作。他们的行动获得湛约翰和皮尧士两位西方传教士的赞许，同时，信徒高露云夫人半价出售一地为筹建华人教堂堂址。1885年教会特聘礼贤会王煜初为主任牧师，主持道济会堂的工作。1888年华人道济会堂建成启用，正式脱离与伦教会传教士的联系，华人自理教会得以名副其实。为推动华人新教事业的发展，道济会堂自设神学训练班，培训传道人才；并结合本会堂毗邻医院的优势，发动医院布道工作，于1890年成立“广东内地医疗传道会”。为充裕经济和照顾贫苦教友，1891年教会在新界大屿山开设“栽植畜牧公司”；1893年在九龙油麻地设立“广道堂藤业公司”。人才和经济上的独立，推动了道济会堂的自理进程。1913年春，堂议会首次按立张祝龄为会牧，成为华人教会的盛事。

第二所较早实现自理的华人教会是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公理堂缘起于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在中环必列者士街设立的传教基地。随教务的扩展和华人教友的增加，租来的铺位无法满足需要，1900年由教友募捐在楼梯街购地新建堂址，次年竣工启用，取名为美华自理会，意谓集合由外国回华，及由内地来港之各会教友共同崇拜之会。^[2]该堂财政完全独立，但为购地的便利，建堂初采用美部会名义立契，以致教会的产业被美部会掌控。为实现教会的全权自理，堂会经多年与美部会交涉，于1911年11月以2万美元买回产权，并易名为中华公理会向香港当局立案，正式宣布成为华人“自养、自传、自治”的中华本色教会。1919年，为促进华人教会的合一，该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并易名为“中华基督教公理堂”。

浸信会虽是最早进入香港的西方差会，但其宣道工作因传教士的内迁而两度停顿，直到约翰夫妇第二次来港才得以恢复。经过教友几次鼎力捐资，1901年11月浸信会于卑利街建成新堂，华人周志、黎田为会吏，并由李禧民等七名华人代表签订契约管理产业。^[3]尽管当时教友只有28人，但这标志着香港浸信自理会的正式成立，为香港的第三所华人自

^[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第35页。

^[2]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第47页。

^[3] 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2月版，第252页。

理教会。

继以上教会自理，香港其他教会的华人也纷纷执行自理计划。至 20 世纪 20 年代，除巴陵会和美部会已迁离外，在港的七大教会均已纳入自理的轨道。其中圣公会圣士提反堂、礼贤会、循道会、崇真会等先后于 1912 年、1914 年、1916 年、1927 年宣告自理。

20 世纪以后，基督教华人信徒开始组织基督教社团，致力于提倡社会道德、精神和知识生活，向教会信徒及社会人士提供服务。1903 年三个平信徒组织建立共同改善协会^[1]，其宗旨是帮助穷人，其兴趣和活动集中于道德和精神的改善；教育、娱乐、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慈善、财政、探访及一般事务。创立于 1907 年的奋兴会主张为整个香港提供服务，在抗战时的救济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培道联爱会则是 1914 年由一群平信徒有感香港社会服务需要而创建的。这些团体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华人基督徒的自主性和成熟程度获得了很大提高。

西方差会时期，基督教各派争相入港设立传教站和接收信徒，彼此交流合作的机会很少。及至华人教会相继成立后，因多集中在上环和西营盘华人社区推展传教工作，教徒和牧师间的来往日益密切，各教会在公共坟场等方面开始进行合作。同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香港教会受到不利影响。为协调各教会的关系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香港基督教的联合已成为必然趋势。

1914 年西江发生严重水灾，全港教会尚无联合组织，乃临时组织人员从事筹款赈灾工作，但事后却没有专人负责。同年秋，艾迪博士至港召开布道大会，要求有组织和人员来开展筹备工作。这两件事情促成了“香港基督教联合会”（后改为“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的成立。1915 年 4 月 8 日，在港七大公会召开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联合会，全名为香港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会议还选举了首届主席皮尧士、副主席翁挺生、书记王爱棠、司库胡尔栋和司数施慎之等职员。7 月，主日学合会、公坟合会和海面传道会归入联合会管理。至此，全港基督教教会的所有合作工作均归入联合会。

香港基督教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本港华人基督教教会，办理教会之共同事业，增进教友之互助精神”^[2]。本此宗旨，联合会日益完善教会的合作事业，加强教会团结，推动香港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联合会组成而言，到 1940 年，堂会由初时的 7 个增至 34 个；^[3] 就其事业而言，1926 年联合会组织成立慈善部，接管圣公会创办的穷人院，并将其改为老人院（即广荫院），抗日战争期间，联合会更进一步发起筹款赈灾活动、节约储蓄

^[1] 这个组织现在的英文名称为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Mutual Improvement Society(香港基督徒共同改善协会)。参加的有博爱基督教会的四个教徒集会、两家诊所、一家来中心一家出版社。

^[2]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 年 11 月增订版，第 171 页。

^[3]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 年 11 月增订版，第 170 页。

运动等，支持大陆的抗日斗争。

联会对香港华人教会的自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联会章程规定，加入该会的教会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须有自赁或自建之圣堂；须有受职之主任牧师或主任传道；须有公选之治会治值理；须有领餐之基本教徒五十人以上；须有教会之自治章程；须能担负该堂常费，每年不少过五百元港币；须在港开设教会至少满足三年；须有经受水礼之会友名册，及收支帐簿，议事记录。”^[1] 这种标准无形中为华人教会确立了自理的目标，即努力迈向自理，争取成为联会大家庭的会员，获得基督教整体的认同，分享教会共同的义务和权利。香港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后，香港华人教会逐渐步入自治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宗教界对祖国所受的灾难深表同情，毅然加入到中国人民抗战的洪流之中。香港新教教会和教会人士为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组织进行募捐筹款工作，将所筹款项派送至国内救济难民，如1937年9月6日成立“国难筹赈会”；二加强香港的工作力度，以满足大量内地信徒涌入的需要；三、设立难民收容所，为避乱至港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为共同应付抗战期间教会工作及救济事业的紧张局面，1938年5月16日，香港所有的基督教教士联合组成“香港基督教宣教师联谊会”。该会以“联络全港基督教宣教师情谊，本互助合作精神，发展基督教救世大业”^[2] 为宗旨，在提高宣教师素养的同时扩展教会事务和救济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难民潮引起的紧张气氛，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

总之，基督新教在这一阶段逐步适应了以华人为人口主体的殖民地环境，完成了由纯粹的西方差会到华人自理教会的过渡，实现了外来宗教本土化，从而呈现出繁荣发展景象。

这一时期香港华人教会开设情况如表 2-2 所示（表格空白处为不详）：

表 2-2 华人教会时期的开设年表

Table 2-2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rche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 church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	1884		道济会堂	1885	第一所华人自立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元朗堂	1889		中华基督教会大埔堂	1907	

[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第171页。

[2]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第181页。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九龙城崇真堂	1890	前为土瓜湾崇真会	香港潮人生命堂	1909	为旅港潮人教会, 林之纯等创
诸圣堂	1891		海面传道会	1911	何丽臣等创
中华基督教深爱堂	1892	1937年自养	圣玛利亚堂	1911	伦义华创
英人循道会	1893	初为循道会 海军堂	便以利会油麻地堂	1914	李顺牧师创
黄宜洲崇真堂	1896		中华基督教会望觉堂	1917	1932年自养
深水埗崇真堂	1897	1928年自立	九龙佑宁堂	1924	
礼贤会香港堂	1898		华人五旬节堂	1925	
圣三一堂	1890	发起人为范女士	中华基督徒恒恩会	1926	
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	1901		香港华人基督会	1926	
香港浸信会	1901		神召会礼拜堂	1928	黎爱华女士首创
中国基督徒会堂	1903	由华人伍汉持发起	礼贤会九龙堂	1928	1933年自理
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	1904		灵光堂	1929	
中华基督教会完全堂	1905		中华圣洁会	1930	
香港仔浸信会	1905	1931年自理	四方福音堂	1936	
粉岭崇谦堂	1905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天泉堂	1937	又名九龙太子道会堂
窝美崇真堂	1905		中华基督教会荃湾堂	1938	
圣安德烈堂	1906	为西人教会	闽南基督教会天光道 闽南堂	1938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1938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恩泉堂	1939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堂名	开设年份	备注
香港闽南堂	1938		神召会圣光堂	1939	
九龙城潮语浸信会	1938	陈联芳等创	圣公会圣马提亚堂	1939	
鸭脷洲浸信会	1938		九龙城浸信会	1939	1931年始创
基督堂	1938	赵学等创	尖沙咀浸信会	1939	1901年始创
礼贤会上水堂	1938		筲箕湾浸信会	1940	
中华基督教会长老堂	1938	梁椒蕃等创	九龙塘宣道会	1940	

2.2.3 困难与复兴时期（1941—1949）

这一时期是香港基督新教曲折发展的阶段。香港被日本占领期间，基督新教的活动转入低谷，大量信徒星散，教会组织减少并受日军牵制。战后，离港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陆续返回；许多内地居民因内战而南迁；香港基督徒人数成倍增长，香港基督教会得以复兴。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25日攻陷香港。日本大规模的烧杀抢掠行为给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基督教会和宗教界人士也同样遭受战争的苦难。

一方面，教会人士遭受日军残酷迫害，教会财产蒙受很大损失。如美南浸信会的远东干事梁根被俘入赤柱集中营，及至美日交换俘虏才脱离虎口。青年会副总干事赵甘霖全家罹难，许多被日军凌辱的妇女，都在女青年会避难，一些教会的教友，甚至传道牧师，因为生计困难而在街头摆摊。^[1] 大批神职人员和信徒或受迫害或逃乱离港，教会活动几近瘫痪。教会财产的损失加大了沦陷时期基督教发展的困难。如香港仔被日军划为禁区后，浸信会的礼拜堂被占用为宪兵分部，堂里家私尽被搬走毁坏。^[2] 又如深水埗崇真堂被日军占用为区政所，该堂学校被迫停止，教会人员星散。日占时期，港币贬值，物质奇缺，香港居民的温饱都难以解决，而教会的经济来源全靠教友的捐献，在教友们多半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教会款项入不敷出也就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日军加强了对香港教会的管制。日军占领香港后，实行“以华治华”的统治政策。针对教会，日军于1943年2月27日组织“香港基督教总会”，以取代“香港基督教联合会”管理全港教会的运作，日本当局还规定各宗派的教会须合而为一，并隶属此一总会。该会由正副会长两名和各部部长数名组成执行委员会，由在港基督教知名人士担任。

^[1] 玉梅：《川流不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2] 徐松石编：《华人浸信会史录》，第一辑（大陆地区），浸信会出版部印行，1972年1月，第79页。

但日军又特派鲛岛盛隆来港担任“最高顾问”一职，作为日本军政府与香港教会间的桥梁，处理其时香港教会的一切事务；另设参议一职，由日人平刚贞和藤田一郎担任，负责监管总会各部工作。这样，总会的实权完全落入日军手中，香港的基督新教在日军的掌控下只能采用简单的家庭聚会等方式得以维持。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战后，逃难的居民陆续回港，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始复元和重组，基督新教的大批神职人员和信徒也纷纷返回。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国内难民大量南流涌入，使香港信徒不断增加。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香港教会一方面对被战火破坏的教堂予以修葺，一面创建新的教堂，并重新组织教会团体和机构。到1949年，香港新增教会达21个，这为香港基督新教在50年代后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2.3 本章小结

综观近代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除抗战沦陷时的短暂停滞外，基本上呈逐步发展的趋势。西方差会时期，来华传教士多以香港为进入中国的跳板和桥头堡，并没有立足本地华人传教，创立的少数华人教会也处于尝试性阶段。华人教会时期，伴随香港经济繁荣和华人知识分子的成长，华人教会开始摆脱对西方差会的依附，走向独立、自主，形成殖民地环境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困难与复兴时期，日本占领香港期间，教会领袖和信徒大批离港，新教发展受挫。但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后，陆续返港的信徒使教会很快复兴。为宣传教义和接收信徒，基督新教各派争相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虽然，作为一种与帝国主义侵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外来宗教，基督新教难免会对香港社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教会及其信徒为传播与发展宗教所做出的努力，客观上对香港乃至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 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

文化传教是基督新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进入香港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早期入华传教士开创的传教方针。除采取兴建教堂、直接宣道等传教方式外，基督新教在香港还通过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开展医疗慈善活动和倡导社会运动等手段扩大基督新教的社会影响，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教育活动、文字事业以及教会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是香港基督新教颇具特色且影响较大的社会活动，本章主要就这三个方面的社会文化活动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3.1 教育事业的拓展

“教育是传教最得力的助手”^[1]。无论是为了建立接触点以传教，还是为了训练华人传道人员以推动中国的传教事业，香港教会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的教育活动虽带有较浓的宗教色彩，对香港教育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客观上推动了香港教育的现代转型。

3.1.1 香港传统教育

陈谦曾指出：“香港在未开埠前，各间村落，只有蒙馆私塾，由老师一人单独授课，教三、数十村童识字、珠算、写信，并未有问应科举试考取秀才者。”^[2]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香港教育的客观情况。1841年以前，香港和内地一样，在黄泥涌、赤柱、香港仔等村落也存在规模不大的私塾。据记载，全岛每年约有50名学生、5位私塾先生，师生人数约占全岛人口的百分之一。^[3]除私塾外，香港地区早年还曾设有几所书院，如建于北宋的力瀛书院和清康熙年间的周王二公书院都是英占前的有名书院。同时，各村各族也有不少用作教学的宗祠，包括居石侯公祠、邓氏宗祠等14处。香港地区也有个别获登甲科、乡试中举之人。据王齐乐研究，由清初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香港地区考获科甲的有锦田邓文蔚（1685年，三甲进士），中乡试的共有11人，中恩贡义贡的共13人。^[4]

香港早期教育承袭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封建教育，其情况和内地大体相

^[1] A.Parker(潘慎文), etc. An Appeal to Foreign Mission Boards for Trained Educators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2]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二），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页。

^[3]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

^[4]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三章《香港的前代教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9月版。

同。一般一所学校只有一名先生，学生们直接向塾师缴纳学费；学生约有二三十人左右，无班级划分；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及古代贤哲为人处世的道理；教授的方法则主要是背诵和书写；教学时间则除上午早餐和中午午饭时间外，便从日出到日落，整天不停；用作课本的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和《五经》等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

开埠后，随着人口的激增，香港教育的需求日增，以私塾为主的传统教育也一度呈现增长趋势。1844年香港政府第一次公布本港学校数字时，便提及在港岛上已有中国传统式的中文书塾七间。^[1] 据欧德理博士记录，到1847年时中文书塾已有九间之多。^[2] 但因港英政府并不热心中文教育的发展，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现实日益脱节，无法满足人们择业的要求，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和官立学校的近代西式教育适应了香港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教育日益式微也就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3.1.2 教会学校的创办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藉以传教的重要方面，香港早期的西式学校几乎都是由教会或教会人士开办。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创办的教会学校，大致以1860年为界可分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重两个阶段。

3.1.2.1 宗教教育阶段

在此时期，基督新教在香港共开办了10余所学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有：

马礼逊学校。这是近代香港最早的一所西式学校，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1842年11月迁至港岛。该校拥有较完善的校舍，包括有正座和两翼的平房建筑。正座前面长63英尺，深55英尺，分成六间房；两翼长各为63英尺，宽24.5英尺，分别是学生宿舍、储物室、图书馆和教堂。^[3] 迁港初期，因受社会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学校发展十分顺利。随校迁港的学生仅11名，迁港后校务有一定增长，学生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学校还在原有中文部的基础上开设了英文部。1844年官方第一次公布教会书馆状况时，曾指出该校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书馆，共有学童32名。^[4] 但随着英美商人和传教士转赴各通商口岸活动，马礼逊教育协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布朗夫妇返美和伦敦会以教育会完全受美国传教士影响为由不再支持办学等因素，最终导致马礼逊学校举步维艰。1849年春，学校宣告停办。

^[1] 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42.

^[2] E.J.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7.

^[3]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9月版，第88-89页。

^[4]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9月版，第91页。

英华书院。马礼逊 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1843 年 11 月迁港。初在伦敦传道会所开设临时预备书馆，次年秋建成新校舍，改名为英华神学院，成为一所专门训练中国传教人才的学校。在港办理期间，书院学生人数最多时达 85 人，著名的唐景星（廷枢）、何昆山、梁柱臣等都是该校学生。伦敦传道会迁港初尚未建立教会，所以英华书院的校舍除用作课室外，还是教徒礼拜和聚集的场所。原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中文印刷所的印刷机器也随校迁入，附设于校内。印刷所主要出版教会书籍、小册子及中文圣经，并创办了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可以说，当时的英华书院实际上担负了教育、传道、翻译和出版等工作。另外，理雅各夫人还于 1846 年创办英华女学，初仅有学生 7 名，到 1850 年增至 13 名，^[1] 弥补了英华书院只收男生的不足。因办学经费不敷使用等原因，1856 年书院停止办理。

浸信会书馆（又名浸会女学）。叔未士夫妇 1842 年设立“宏艺书塾”，这是浸信会在港岛最早的教育活动。1843 年，叔未士夫人何显理在皇后道浸信会堂内开设一所女塾。叔夫人亲自任教英文，还抽空教授针黹及手工等科目，中文则由华籍教师教授。初期，书塾仅招收欧籍军人的女子，后来也招收中国女子就读。女塾开办后不久，学童人数日增，原有塾舍不敷使用，1844 年 9 月在荷里活道建成颇具规模的浸信会书馆。新的书馆校舍面积，长 55 英尺，宽约 27.5 英尺，楼高两层，内设有教室、饭堂、厨房、男生宿舍和教员卧室等。^[2] 同年 11 月，何显理女士逝世，学校因乏人主持而中断。有学者对叔夫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第一位到港的西妇；第一位来港的女宣教师；本港创办女校的第一人；第一位在港安息的宣教师”^[3]。

圣保罗书院。圣公会史丹顿牧师抵港后非常热心教育事业，除创办一所专门招收英国儿童的小学外，他还于 1849 年春创办了著名的圣保罗书院，用来训练本地牧师。该书院初设于中环，后经政府拨地，1851 年建成新校舍，与会督府合而为一。圣保罗书院兼招中西学生，初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教导学生，后几经改革，学校规模日大，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即为该校早期的学生。

另外，美国公理会于 1844 年在港还设有书馆一间，有学童 6 名。^[4] 但到 1848 年，这间书馆已不存在。

这一阶段，教会办学的主要动机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培养本地传教士，教育成了传教的工具。如史丹顿牧师就毫不隐讳其办学动机：“改变中国人信仰的工作，与其用外

^[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 年 11 月增订版，第 197 页。

^[2]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 年 9 月版，第 94 页。

^[3] 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 6 月版，第 4 页。

^[4] 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3.

国传教士，不如用中国传道士去做。”^[1] 圣保罗书院的办学章程确定该校办学目标为“按照英国圣公会的原则，为在华传播福音，培养一批本地牧师和信奉基督教的教师”^[2]。教会学校以宗教教育为主，《圣经》是此类学校的必修科目。但教会学校发展缓慢，传教士试图通过宗教教育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努力并不成功。中国居民多抵制基督教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不愿子女就读于教会学校。许多华人学生的入学动机仅仅是习英语以谋职。加上开埠初客观环境的恶劣和办学经费的紧张，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大部分教会学校陷入衰退停滞状态，有的甚至被迫关闭。

3.1.2.2 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重阶段

这一阶段，教会及教会人士创办了近 40 余所学校，具体情况如下：

英国圣公会的史密斯夫人 1860 年于西营盘第三街创办拔萃女学。学校原名为“拔萃女子训练学校”，专以教育华人女子为宗旨，1869 年开始不分种族招收男女学生，1890 年，校方认为男女生不应该同校读书，乃将学校改为“拔萃男书院”，专收男生，而另设女学。由于学生人数日增，1924 年学校乃于九龙半岛选择地段，二年后建成新校舍。据刘粤声记载，1940 年该校可容纳学生 500 名，住宿生 100 名，^[3] 是近代香港著名教会学校之一。

圣公会教友 1886 年于西营盘创设飞利女学，该校后来发展为协恩女子中学。最初的学生大多是基督徒的子女，后来也招收非基督徒子女，学生人数激增。因管理良好，该校 1930 年依香港教育司及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课程与编制创设中学。1933 年又增设高中。同年学校与维多利亚小学联合，易名为“协恩”，取两校“协力同心，共沐基督之恩，互相扶助造成一完善学校，荣归上帝之意”^[4]。这所学校几经搬迁，现位于九龙码头角。

作为英国的国教，圣公会为香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后期创办的学校还有：白思德女书馆、白思德纪念书馆、诸圣堂义学、圣士提反女中学、圣保罗女中学等。

此外，其他各新教团体也顺应社会的需要，纷纷在港创办学校。1861 年，德国巴陵会设立巴陵孤儿馆，专门招收女童。同年，该会于西营盘高街设伯士大书院，以造就传道和医学人才。崇真会的黎力基夫妇 1866 年于西营盘崇真堂创立一所女学，由骆润滋牧师主持学务，1891 年该校迁往宝安。美国公理会 1883 年于必列者士街开办华文日校及英文夜校；1909 年创办了著名的美华女校。美华女校初招学生仅 20 名，教员 1 名，手织教员 1 名。1913 年易名为公理女校。至 1914 年，学生增至 34 名，教员 3 名，义务教员 5 名。1925

[1] E.J.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hina Review, Vol.19, No.5 p.317.

[2] E.J.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hina Review, Vol.19, No.5 p.317.

[3]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 年 11 月增订版，第 196 页。

[4]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 年 11 月增订版，第 201 页。

年学生增至 406，教员 15 名。^[1] 1914 年伦敦传道会于坚道重办英华书院，该校创办后学生云集，颇受社会欢迎。

另外，香港沦陷前，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因战争影响而无法在内地照常办理，纷纷迁往港岛。如广州的真光女子中学、培英中学、培道女子中学、华英女子中学、华英中学、美华中学等，这些学校迁港后都得到香港新教的大力支持，形成此时期香港教会办学的亮点之一。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是教会学校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界址的拓宽和大陆政局的波动以及香港经济的繁荣等因素使 1860 年后香港的人口剧增，教育需求越来越大。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府一改放任自由的教育政策，开始对私塾和教会学校予以补助，从而主导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873 年政府颁布《补助学校计划》，规定凡接受补助的教会学校每天应有 4 小时的非宗教课程，对宗教教育予以限制。这一时期的新教学校普遍接受港英当局的经费资助，因此世俗课程的比重有所增加。1903 年后政府进一步修改补助计划，将经费主要用于规模较大且管理较完善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在政府补助计划的支持下，日益发展成为香港的知名中学。与此同时，新教教会人士如理雅各等吸取早期宗教教育失败的经验，逐渐增加教会学校的实用课程比重，使学校教学内容由偏重宗教教育向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重的方向转变。

基督新教在香港创办的重要的教会学校如表 3-1 所示（表格空白处为不详）：

表 3-1 香港基督教学学校发展表

Table 3-1 the development of Hongkong Christian school

学校名称	创办年份	所属教会	校址	备注
宏艺书塾	1842	浸信会	上环百步梯	主要传播基督教教义
马礼逊纪念学校	1839	马礼逊教育协会	摩利臣山	1842 年 11 月迁港
英华书院	1818	伦敦会	伦敦会内	1843 年迁港, 1856 年停办, 1914 年重办
美国差会男书馆	1843	美部会		包尔博士主办
美国差会女书馆	1843	美部会		包尔夫人主持

[1] 黎汝豪：《公理女校二十五周年小史》，载《香港公理堂五十周年纪念刊》，香港公理堂，1934 年，第 17 页。

学校名称	创办年份	所属教会	校址	备注
圣保罗男书院 (中学)	1843	圣公会	初在中环后搬 铁岗	史丹顿创, 1867年停办, 1915 年办女中, 1919年重建男中
浸信会书馆	1844	浸信会	荷里活道街	叔未士夫妇创办, 次年停办
英华女学	1846	伦敦会	西摩道	理雅各夫人主持
巴陵会书馆	1849	巴陵会	摩利臣山下	
中华公理会女学	1853	公理会		
拔萃女学	1860	圣公会	西营盘第三街	史密夫会督夫人创办
白思德女馆	1861	圣公会	香港回教寺台	后两馆合并于般咸道白思德馆
白思德女馆	1861	圣公会	史丹顿街	
巴陵孤儿馆	1861	巴陵会		
伯士大书院	1861	巴陵会	西营盘高街	
西营盘崇真堂女学	1866	崇真会	西营盘第三街	黎力基夫妇创办
拔萃男校	1869	圣公会		孙中山曾在校就读
白思德纪念馆	1876	圣公会	荷里活道街	
约翰夫人女学	1880	浸信会	荷里活道街	约翰夫人创办
美部会公理书馆	1883	公理会	必列者士街	1898年停办, 1901年于楼梯街 复开, 1914停办
巴色会义学	1885	巴色会	深水埗福州街	娄士牧师创办
飞利女学	1886	圣公会	西营盘	为协恩女子中学前身
巴色会书馆	1890	巴色会	九龙土瓜湾	
诸圣堂义学	1896	圣公会	上海街榕树头	
圣士提反男中学	1903	圣公会	西边街	1929年建成赤柱新校
幼学书室	1904	浸信会	荷里活道街	1913年停办
圣士提反女中学	1906	圣公会	坚道	
浸信会女校	1921	浸信会		1931年改办男校
圣彼得学校	1928	圣公会		

注: 纯为欧籍学童开设的学校未列入表格。

资料来源: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 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7年7月版, 第162—163页; 王齐乐:《香港

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9月版，第127页；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6年11月增订版；蔡儿：《香港名校巡礼》，香港周刊出版社，1986年4月版等。

3.1.2.3 教会学校的特点及成就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创办的学校具有与中国传统中文教育不同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与新教在中国其他地区办学不同的区域特色。教会出于宗教目的而办学，但客观上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

其一，教会学校长期偏重英语教学。为招徕华人就读，早期教会学校对中文教育比较尊重，所设课程中、英兼备。如马礼逊学校早上进行英语学习，下午教授中文知识。但随着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港英当局为维护其殖民统治而对英文教育的大力推行，英语逐渐成为教会学校的核心课程。王韬在《香港略论》一文中对教会学校偏重英文教学的特点有所提及，谓：“有保罗、英华二书院，又有所谓大书馆者，皆教子弟肄业英文，岁不下二三百人。……另设女书馆二三所，亦以英文为主，特兴废不常。”^[1] 教会学校的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一般情况下，教会学校的学生经过三、四年学习之后，都具备有相当牢固的英语基础，英语读、写、听、说和翻译的能力都较强。香港教育这种“重英轻中，以洋为主，以华为次”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亲英的殖民色彩，但客观上为香港乃至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的英语人才，为中西文化交流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二，教会女学突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中国大陆一样，香港开埠前的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并无接受教育的可能。香港女子教育是以教会女学为开端的。1843年何显理女士开设浸会女学，该校与当时的英华书院和马礼逊学堂同负盛名，是近代香港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现今香港的何显理中学即为纪念何女士而设。之后，各差会纷纷设立女学。香港最早成立的一批教会学校中，女学占有相当比重，如浸信会女学、英华女学、美国差会女书馆、拔萃女学、飞利女学等。香港教会女学的兴盛，使部分女子冲破闺门禁锢，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成为近代香港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从而推动了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三，就培养本地传教士的目标而言，教会学校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的。因宗教教育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教会学校对华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即便是入校的华人学生，也大多是因为贫困，或是出于英语学习的需要。如一位华人学生在日记里说到：“父

^[1] [清]王韬：《香港略论》，载《弢园文录外编》（第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77页。

亲根本不希望我成为书生，至于成为基督徒那是断然不准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学好英语来帮他赚更多的钱。”^[1] 但教会学校培养的大批英文人才，适应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量的增长趋势。教会学校的华人学生毕业后，担任传教士的人并不多，他们有的在港英政府担任职员或翻译，有的在香港或其他通商口岸任洋行买办，有的到中国某些官方机构任职，有的到国外升学或谋生，^[2]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西学人才。

3.2 文字事业的开创

中国新闻报刊出版业由来华传教士开其先河。进入香港的传教士在港岛也努力开展文字活动，推动了近代香港报刊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不同的是，和中国大陆相比，宽松的传教环境使基督新教在香港的文字传教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其早期报刊和译著对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影响很大。

3.2.1 报刊的创办

近代基督新教教会及其信徒在香港创办的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大光报》、《奋兴月报》等，对近代香港的报刊业有倡导之功。《遐迩贯珍》是驻港传教士创办最早且影响最大的报刊。该刊不但是近代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下面以《遐迩贯珍》(The Chinese Serial)为例，来探讨新教在香港的报刊事业及其重要的社会影响。

3.2.1.1 《遐迩贯珍》的创办及停刊

《遐迩贯珍》的创办与伦教会和马礼逊教育协会均有密切关系。英华书院迁港时，原设在书院内的中文印刷所的印刷机器、铸字机、铅字粒等设备也随校迁入。由于人才、经费等各方面条件不足，该院最初主要出版一些传教书籍或小册子，而没有贸然从事报刊的创办工作。1849年马礼逊学校停办后，马礼逊教育协会将其一部分资金用于中文报刊的出版上，而欧美部分商人也开始捐资相助，这为报刊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经费来源。1853年富有中文报业经验的传教士麦都思接受《遐迩贯珍》的编务工作，同年8月《遐迩贯珍》在香港正式刊行。

《遐迩贯珍》先后由著名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担任编辑。麦都思既是一位

^[1] 转引自钱英：《十九世纪香港教育的世俗化与中西文化交流》，载《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2]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9-171.

富有经验的出版人才，也是当时伦敦会在华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在任《遐迩贯珍》编辑的同时，还担任了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其工作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对他而言，在刊物创办初期尚可勉为其难地抽空编辑，但长期负责繁杂的编辑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一开始，麦都思就在物色“谙习英汉文义”的专门人才担任编辑。对此，麦都思自己也曾提及：“吾屡念及此，思念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现经四方探访欲求一谙英汉文义之人，专司此篇纂辑，尚未获遣乃翘首以俟其人，乃先自行手为编述，尤胜于畏难而不为也。”^[1]一年后，曾协助编辑过《各国消息》的奚礼尔接任编辑。但奚礼尔当时是香港殖民政府的官员，也非专业的编辑。他接任《遐迩贯珍》的编辑后，一直兼顾政府方面的重要职务。1855年奚礼尔因政府职务之需离港，编辑工作转由传教士理雅各负责。理雅各是香港新教的重要人物，在香港教育等方面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和前两任编辑比较，理雅各更无法全心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1856年英华书院被迫关闭，同年5月《遐迩贯珍》停办。

可见，《遐迩贯珍》是由马礼逊教育协会提供资金、传教士创办、在英华书院印刷的定期刊物。自1853年8月出版，到1856年5月停刊，该刊历时近3年，共出版了33期，发行数量每期达三千本，发行区域除香港外，还有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

《遐迩贯珍》主要销售人群是西方人士，也有部分内地官民阅读，但多属赠送。其停刊的重要原因，理雅各唯一的解释是“办理之人，事务纷繁，不暇旁及”^[2]。从该刊历任的三位兼职编辑来看，应是办理人手的不足最终导致其命运的短暂。

3.2.1.2 《遐迩贯珍》的内容特色

从李志刚博士提供的《遐迩贯珍》全目录^[3]来看，该刊所载内容主要包括时事新闻、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三个方面。

和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华所创报刊相比较，时事政治是《遐迩贯珍》特色内容之一。《遐迩贯珍》每号都有“近日杂报”一栏，专门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加上时事政治评论文，时事政治的内容几乎占全刊三分之二的篇幅。以时事政治为主的这一特点，与当时中国门户洞开和香港归英国政府统治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在华权利的扩大和香港远离清廷的法律约束，使外国人对政治宣传报道的顾虑相对减少，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侵略性。但《遐迩贯珍》的时事新闻涵盖面很广，对国内外大事、民间活动、盗匪抢劫

^[1] 转引自[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0页。

^[2] 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39-140页。

^[3]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3-147页。

及欧美政情等均有刊登。这些新闻除有利于增加时人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外,对史学界而言也是一笔丰富的史料。尤其是该刊对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的报道,较清官方记载要客观、公正,至今仍为史学界所重视。如据《佛兰西公使赴天京记》一文记载,南京城内秩序良好,这与清朝官方记载的太平天国滥杀无辜大相径庭。^[1]当然,作为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刊物,从总体上看,《遐迩贯珍》是站在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利益的立场上来发表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如《上海税务补衰救弊原委》^[2]一文全力为外国商人偷税逃税开脱,还力陈上海海关交由英、美、法三国管理的好处,主张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外贸政策。

科学文化知识也是《遐迩贯珍》的内容之一。《遐迩贯珍》不仅介绍自然科学,而且刊登了大量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方面,该刊除介绍一些一般科学常识外,还登载有一系列科学理论性的文章。如《火船机制略述》^[3]介绍了当时西方火船科技;分期连载的《全体新论》^[4]对人体器官、骨骼、脏腑等生理知识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尽管对欧美而言,这些只是常识浅说,但对当时的华人而言却是一种新知。社会科学方面,该刊侧重于登载有关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文章。如《英国政治制度》^[5]、《花旗国政治制度》^[6]等文,对英国的君主立宪、上下议院与内阁的关系、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等都作了详尽介绍;《补灾救患普行良法》^[7]介绍了英美各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的内容和作用。传教士登载这些文章的主观目的是向中国显示西洋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从而达到改变中国人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印象。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客观上增长了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国人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解决国内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遐迩贯珍》也登载了部分宗教内容,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香港拥有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口头传教”和“医疗播道”等传教方式得以展开,“文字传教”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对减弱,因此,《遐迩贯珍》的宗教色彩较早期刊物要淡得多。该刊登载的直接阐述宗教教义的文章只有《崇信耶稣教略》^[8]一篇。但许多文章在论述中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基督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在解释各种现象和事件时,文章往往会牵强附会地把上帝联系起来,体现其宗教性。如《耳官妙用论》^[9]是一篇介绍耳朵的生理结构与作用的科学性文章,但文章最后却用一句“上帝赋界之神能,观此可知矣”,将耳朵的功能与上帝的

[1]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撰:《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5年9月版,第539页。

[2] 《遐迩贯珍》,1854年10月第10号。

[3] 《遐迩贯珍》,1853年9月第2号。

[4] 《遐迩贯珍》,1855年1月第1号至11月11号(4月号、9月号除外)。

[5] 《遐迩贯珍》,1853年10月第3号。

[6] 《遐迩贯珍》,1854年2月第2号。

[7] 《遐迩贯珍》,1854年1月第1号。

[8] 《遐迩贯珍》,1856年2月第2号。

[9] 《遐迩贯珍》,1855年8月第8号。

赋予联系起来，以突现上帝的重要性。

《遐迩贯珍》登载的大量时事政治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对处于封建迷信中的人民发挥着启蒙作用，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同时也标志着鸦片战争后教会报刊宣传重心的转移。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遐迩贯珍》虽是教会刊物，但其内容却首为政治，次为文化科学知识，最后才是宗教。这反映了外人所办的中文期刊在鸦片战争后期对华宣传重点的转移，即由宗教向文化知识又向时事政治的转移。^[1] 该刊内容上的创新性是同期其他中文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它对其后香港和中国报刊较多地刊载各种介绍西方文化的文章和政论色彩较浓的文章有一定影响。

3.2.1.3 特征及影响

《遐迩贯珍》在许多方面开华文报刊之风气，对中国近代新闻报刊业影响至巨。

十分重视时事政治，是《遐迩贯珍》重要特征之一。报刊对国内外新闻的登载并非起于《遐迩贯珍》，但该刊对新闻报道进行了重大改革：详细地将新闻分类；采用一般消息、短讯、通讯、述评等形式多样的报道方式；在报道和评论国内外重大事件时，该刊上的文章还常夹带着作者的观点、立场，有些颇类似于今天的政论文和编者按语。

《遐迩贯珍》是中国第一份采用活铅字技术印刷的刊物，在中文报刊业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时，就已采用活铅字机器印刷技术，迁港时，先进的印刷机器、铸字机和铅字粒全部随校迁港。《遐迩贯珍》停办后，黄胜、王韬得以购买该刊的先进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华人自办的报刊《循环日报》，从此香港中文印刷业务进入新的里程。

由于赞助者与购阅者主要是在华的西方人士，或又因其出版地点华洋杂处的特色，该刊每期并有一页比中文目录还详细的英文目录，开中文定期刊物登载英文目录的先河。

《遐迩贯珍》从 1855 年第 1 号起，开始增设“布告篇”一栏，所载内容大体相似，如船期、市价、医生招揽病人以及书院招收学生等，该刊编者称这些内容为“招帖”。为补充办报经费，该刊对所登“招帖”收取一定费用，其收费标准是“五十字以下，取银半分，五十字以上一先士，若帖再出，则取如上数之半”^[2]。《遐迩贯珍》的这一举措实开中文报刊刊载广告和征收广告费用的先河。

从以上对《遐迩贯珍》的探讨可见，基督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推动了香港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整个中国报刊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 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第 12 期，第 92 页。

^[2] 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 年 5 月版，第 136 页。

3.2.2 著译的出版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著译活动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熊月之统计，在 1843 年至 1860 年间，传教士在香港出版各种西书就达 60 种，其中宗教书籍 37 种，占 61.7%，科学书籍 23 种，占 38.3%。^[1] 和当时五大通商口岸相比，香港的西书总数仅次于上海。尽管随着中国内陆城市的开放，传教士将出版西书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但他们在香港也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辞汇。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为了帮助外国人掌握汉语和粤地方言，来港传教士也致力于汉语言研究，并出版了一批汉语言研究著作，主要的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 1896 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2]

其次，香港传教士在中外经典译介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是对中文《圣经》的翻译出版上取得很大进展。1843 年来华各差会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首次译经会议，讨论在华《圣经》的翻译工作。会议统一了一些中文圣经译名，并为求中文译本的完善，决定成立一总委办会，其下设地区委办会，专门从事圣经翻译工作。此次会议对中文圣经的出版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会后，总委办会在麦都思的领导下展开圣经委办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1850 年，委办本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相继出版。1853 年新约在英华书院印行，次年旧约的翻译也得以完成，定名为《新约全书》及《旧约全书》。其后，《委办本》（前称为《会使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资助印刷。而各地方委办会的各种工作则促使了多部中国方言圣经的出现，主要的有 1847 年出版的上海语《圣经》、1852 年的厦门语《圣经》、1854 年的福州语《圣经》、1856 年的南京语《圣经》、1860 年的客家语《圣经》、1868 年的广州语《圣经》等。

另一方面，理雅各在香港译成的《中国经书》（Chinese Classics）将中国儒家经典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西方，是西方汉学的一座丰碑。理雅各自 1843 年抵达香港后，除 1854 年

[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8 页。

[2] 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 6 月版，第 102 页。

一度回国休养及 1867 年返英省亲外，其他在华时间均与香港休戚相关。早在 1847 年返港时，理雅各就立志深入研究中国学术。他在参观广东贡院时曾感慨地说：“诚然中国之文化与英土迥异，然彼之文明与野蛮相去甚远。”^[1] 他认为，一个民族如能卓然独立于世，就一定有其民族特质，那么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就必然寓有伟大的道德与社会力量。因此他决心把整个儒家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绩”^[2]。在中国学者王韬、黄胜、罗祥等的协助下，理雅各历经近 25 年的努力完成了总集题名为《中国经典》的不朽之作：1861 年《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港出版，为《中国经典》第一、二卷；1865 年《书经》、《竹书纪年》汇印为《中国经典》第三卷；1871 年《诗经》上下两部在港出版，为《中国经典》第四卷；1872 年《易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在香港出版，为《中国经典》第五卷，至此中国的《四书》、《五经》被完整地译成英文。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开展的文字活动，一方面是一种优势文化的强制性输入，另一方面，这种活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近代香港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3 社会运动的倡导

基督新教救世博爱的理念使教会及信徒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怀，主张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以基督教的伦理原则改造社会，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救赎。基督新教自传入香港后，就非常热心参与社会事业。华人教会实现自理后，更是视社会事业为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早期，教会倡导的反对蓄婢运动就是教会领袖及其信徒关怀社会、鼓吹社会改良，从而赋予基督教以一种社会意义的典型例子。

3.3.1 反对蓄婢运动始末

蓄婢（清末称为养“妹仔”）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香港承袭中国传统文化，其官绅士大夫也保留着这一习俗。由于婢女可以买卖，从而引发劫掠、拐买、虐婢等严重社会问题。据一曾在香港工作过的女传教士记载，在她所任教的学校里，每年都会有两个

^[1] 转引自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 年 9 月版，第 139 页。

^[2] 转引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2 月版，第 594 页。

或更多聪明、可爱的女孩失踪。^[1] 而婢女受主人虐待的情形也令人发指，诸如：任供主人使役，不得睡觉；或被殴打，以致遍体鳞伤；或被藤条鞭达，淤伤累累等等，都是香港虐婢常见之事。^[2]

早在 1844 年港府就曾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令，^[3] 但因其视蓄婢为《大清律例》所容许的中国传统，或把蓄婢看成是一种认养义女的制度，故对此不加干涉。1917 年香港发生虐婢诉讼案件，各大报刊对此案件详加报道和宣传，婢女问题因而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1919 年信奉新教的西士路活夫妇因履任新职而抵港，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其反对蓄婢的意见，并联络英国议员，使反对蓄婢的呼声扩展至宗主国。

迫于香港和国内的舆论压力，英国理藩院（殖民事务部）不得不令港府调查“妹仔”的实际情况。1921 年 7 月 30 日，殖民政府授权定例局收集市民意见的讨论大会在香港太平戏院召开。“是日到会者约三百余人，耶教人亦不少”^[4]，足见新教信徒对此事的关注。但会议为刘铸伯、何泽生等富商士绅所操纵，他们事先拟定了隐含维持蓄婢动机的六项主题^[5] 交由大会讨论。因此，尽管会议上反蓄婢的呼声很高，但付诸表决时，却一致“否”决了英国政府对香港存在婢制问题的质疑。

教会领袖和信徒深感会议为官绅把持，使反对蓄婢一派的意见无法发挥，有违取缔蓄婢的原意，更欠表达民意的实质。8 月 3 日礼贤会王爱棠牧师在《大光报》发表《揭明蓄婢会议之否认原因》一文，他指出会议所否认的“非否认取缔蓄婢为不宜也，亦非否认此种流弊为非事实也”^[6]。王爱棠的言论引起了反对和维持两派的论争，随后两派人士纷纷著文论说自己的观点，香港舆论界围绕蓄婢与否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笔战。

新教向以传福音为职使，力持人道主义，故不能忍受一般女子沦为悲惨的婢女。为广泛地发动社会人员和更好地开展活动，教会人士决定组织成立反对蓄婢会。1921 年 8 月 8 日，反对蓄婢会第一次组立会议在杨少泉医馆召开，赴会者共 26 人。会议公举黄茂林为临时主席，杨少泉为副主席，定会名为反对蓄婢会，并选举杨少泉、黄茂林、黄永德等八人起草会章。8 月 15 日第二次会议通过反对蓄婢会会章，并举王爱棠起草大会宣言书。此后，反对蓄婢会一面展开蓄婢现状调查和宣言书的派发、演说等事项；一面加紧本会的组

^[1] 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香港历史资料文集》，Urban Council 香港市政局出版，1990 年 10 月，第 33 页。

^[2] 参见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第 133 页。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p. 109-111.

^[4]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 年 10 月版，第 4 页。

^[5] 六项主题是：一、养婢是否系养育以为妓女？二、为婢者是否为奴？三、为婢者是否供男子取乐之用，俟男主人厌弃之时，即转售他人？四、养婢之习惯，中国曾例禁否？五、为婢者其主人是否可任意将其难为？六、其余关于养婢之内容各事。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 年 10 月版，第 3 页。

^[6]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 年 10 月版，第 27 页。

建工作，积极征集会友和筹备活动经费。到次年2月6日二十二次组立会议时，该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征集了会友1636名；筹得会费达683元5角；获得捐款1129元1角。^[1] 1922年3月16日，反对蓄婢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者有600多人。会议公布了35条会章，规定反对蓄婢会“以维持人道废除婢制使婢主得觉悟、婢女得解放”^[2]为宗旨。会议还宣读了反对蓄婢会宣言书、选定了第一届值理会成员，设正会长一名，由黄茂林担任；副会长两名，由杨少泉、周怀璋任职。

在反对蓄婢会力主废除婢女制度的同时，香港出现了一种不和谐的音符。1922年春，曹善允、周少歧等香港名流商绅组织成立防范虐婢会（或称保护婢女会、保留婢制会）。该会认为，婢女大量存在是父母贫穷无法养育所致，“禁止蓄婢，似非其时”；“若要禁绝婢女，除非省城有工艺厂方可”^[3]；废除婢制会导致社会混乱；英国之所以要求香港取缔蓄婢，是由于存在虐待苛刻婢女的现象。所以该会“只赞成保护婢女，防范主人虐待，极不赞成禁绝”^[4]。

针对防范虐婢会的对立，反对蓄婢会加大了禁婢的宣传力度：一方面派遣会员到香港各教会、学校、工团、街坊、社团演说，介绍该会宗旨和工作，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反对蓄养婢女的陋习；大量印发宣传单张；将各种反婢言论翻译成中文或英文转载，充分发挥报刊的媒介作用。另一方面保持与希士路夫妇的联系，通过他们加强英国的舆论宣传。迫于舆论压力，1922年5月29日防范虐婢会表示禁婢，并与反对蓄婢会商议拟就了禁婢办法三则。

上书政府是反对蓄婢会禁婢的另一重要举措。1923年1月，反对蓄婢会先后在东华医院、青年会会所举行香港街坊大聚会和工商总团、华工总会及各社团大聚会，公开讨论婢女及废除婢制的问题，并获得一致主张实行禁婢的讨论结果。会后，反对蓄婢会将讨论结果上书至殖民政府。1923年3月15日，香港政府颁布禁婢新例草案，对家用女仆的使用、转让以及一定年龄释放等做了一定限制，并规定限日进行婢女注册工作。

但是，禁婢新例颁布后流于形式，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施行，婢女注册工作也因为无须缴付相片而出现冒名顶替的弊端，个别婢主还将其所保留的婢女谎称为养女。因此1929年2月反对蓄婢会再次上书港府，详细陈述禁婢理由，请求政府下令对婢女和育女（养女）同时注册，并要求注册时加贴相片以杜绝冒名顶替的现象。同12月政府下令婢女注册。

1935年3月，反对蓄婢会分别向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1]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45页。

^[2]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49页。

^[3]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142-143页。

^[4]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145页。

界书局上书，请求将禁婢的意义编入教科书，从而使国民了解蓄婢对人道的违背。同年9月，该会因育女注册仍未执行再次上书香港政府，请求育女注册，以防止婢主用育女做掩护继续保留婢女。

1936年反对蓄婢会再次起草呈文，并发动全港市民签名。8月该会将呈文和签名册一起转寄至英国理藩院，请求英国政府着令香港当局废除婢制，使“非凡亲生女而在其家者，皆令注册”^[1]，从而彻底消除隐藏婢女的可能性。

1938年6月24日，香港政府下令育女注册，规定：“凡在本港女童未及念一岁，曾经由一家转让与他家者，无论育女或受保护之女童等，必须在华文政务司署，或大埔理民府署，或各区警署注册。由六月念四日起，不遵者治罪。”^[2]至此，香港婢制得以彻底废除。

综观反蓄婢运动的全过程，反对蓄婢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会从成立最初动因，到真正策划与贯彻执行，新教教会领袖和信徒都积极参与了反对蓄婢会并处于领导者地位。自1921年发起组织反对蓄婢会到1938年香港政府宣布育女注册，教会人士历时15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废除婢制的目的，期间经历的困难与挫折足可见证香港教会“社会关怀”的实践。

3.3.2 反对蓄婢运动影响

反对蓄婢运动是一次由基督新教领袖和信徒倡导、参与的社会改革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香港的社会风气，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对中国社会革新运动的发展也有推动之功。

反对蓄婢会采取征文、演讲、发传单等方式，在香港地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婢制宣传。这种强劲宣传活动，促使全体社会人员认知了婢制的恶劣性，提高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公民法律、道德意识；此外，还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加速香港政府颁布禁婢法律的进程，废除了婢制，改善了香港的社会风气。

香港反对蓄婢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婢制的废除进程。虽然民国政府早在成立时就颁布了公民“平等”、“自由”等相关法律规定，但因社会上层多保留有佣人等诸多掣肘，婢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反对蓄婢会除向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上书外，还上书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各省县政府，从而引起中国对婢制问题的重视。大理院长徐谦依据《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国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等相关内容提议禁止蓄婢，他认

[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月增订版，第285页。

[2]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月增订版，第285页。

为婢女是奴隶的一种，“民国中尚容许一种奴隶制度，实足以貽国际之羞，违反约法，莫此为甚”^[1]。1922年2月24日，民国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下令严禁蓄婢：“……兹特明令严行禁止，嗣后如再有买卖典质人为婢及蓄养者，一经发觉，立即依法治罪，著内閣大理院分别咨令各省行政司法长官令饬所属一体奉行，并着内务部通行各省通妥筹贫女教养办法，以资救济，此令，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2]随后，各省市县政府纷纷颁布禁婢法律。1926年12月佛山市政府颁布了十三条解放婢女暂行条例。1927年1月广东政府明令解放奴婢。同年内政部颁布维护人道保障女权通令。

从国内废除婢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缴销契约、登记注册和设立教养院等办法来看，中国婢制的废除深受香港反对蓄婢运动的影响。如恩平县在解放婢女的过程中就效仿了香港所采用的“所有身契送帖，具照办法缴销，立册登记”^[3]的办法。

反对蓄婢运动是香港华人基督徒的首次有组织地反抗社会弊病的行动，不仅废除了香港蓄养婢女的陋习，也促使中国奴婢制度画上了句号。在教会整体讳言“社会关怀”和“政治”的情况下，部分教会领袖和信徒通过宣传、集会和向政府施加压力等方式，促使香港政府通过立法废除了婢制，这是教会人士所表现出来的最早的参与社会和政治的倾向性活动。正如李志刚博士所评价的一样：“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多大的权势，他们本着基督赋予正确的良知和正直的勇气，终于使一班有权有势的立法者改变了法律，改变了观念，这可以说是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是教会信徒对社会美好的见证。”^[4]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宗教目的，但客观上适应香港社会的发展，为香港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85页。

[2]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86页。

[3] 麦梦生：《反对蓄婢史略》，香港福兴中西印务局，1933年10月版，第283页。

[4]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48页。

第四章 香港基督新教的传播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是外来宗教对以华人为人口主体的殖民地环境的适应过程。和中国其他区域相比较，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并对香港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

4.1 传播特点

作为中国南疆的一个岛屿，香港并非基督新教着意经营的传教点，但历史却又使这一区域在中国近代具备了一些有利于新教发展的因素。经近百年的努力，基督新教逐渐适应了香港这一独特的殖民地环境，获得广泛地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除有全国范围内的共性外，还存在自己鲜明的地域色彩。

4.1.1 教会与政府关系密切

近代基督新教凭藉不平等条约而获取在华传教特权，通常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侵略手段，晚清政府虽被迫允许传教，但又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抵制基督新教在华的传播；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虽宣布宗教自由政策，但他更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外来宗教干预中国的内政。香港则是信奉基督新教的英国在华殖民地，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认同和支持。教会与政府的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香港基督新教的显著特征之一。

一方面，殖民政府长期任命传教士担任政府的重要职位，保持教会与政府的良性合作关系。在1843年8月至1851年8月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传教士郭士立一直担任港督中文秘书一职。香港教育要职更是长期由传教士出任。1852年3月，香港总督任命维多利亚会督司蔑为教育委员会常务主席，该委员会也因而受宗教利益的主导，偏向于主张基督徒任教，这就使受政府补助的官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一样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之下。从香港总督戴维斯1847年3月13日给殖民部的信中，可透视政府对传教事业的支持：“倘若这些学校将来能够完全由受过新教的传教士所熏陶的基督徒担任教员，那就可以使得把本岛原有居民归信基督教得到最合理的展望了。”^[1] 其后香港教育制度虽几经改革，教育机关设置也变动不已，但传教士在教育机关中的特殊地位始终如一。1856年至1860年，礼贤会牧师罗存德一直担任官立学校视学官；1879年至1897年，原崇真会传教士欧德理牧师担任教育司的教育督学；理雅各、施美夫、湛约翰等牧师也先后任职教育委员会或考试委员会。

^[1] 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6月版，第38页。

这些传教士一般都兼顾政府工作和传教事业，如郭士立白天办理公务，晚间则宣讲教义、招收信徒。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发挥了传教士在中文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殖民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和面向华人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对香港教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对传教事业大致上持友善和支持态度。兴建教堂是传教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传教成果的重要标准。在中国近代教案中，不乏因传教士强行租赁土地兴建教堂而引发民众反教情绪，最终导致教案悲剧的例子。香港政府或以赠送或以购买的方式使教会都能寻觅适当的建堂地段，从而避免了教会与当地华人的摩擦，传教阻力得以减轻；政府有时还会以捐献或贷款的方式弥补教会建堂资金的不足。如香港首间新教教堂所在的皇后大道滨海地段即为政府免费赠予的，其建堂费用除澳门、广州外侨捐献的 1500 元外，还获得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驻港海军司令各自捐献的 50 英镑。^[1] 又如深水埗崇真堂在建堂过程中曾向香港政府贷款二千元，并向政府购买三千英尺的地段。^[2] 圣公会与香港政府合作机会较多，香港政府体制里曾设殖民地牧师一职，均由该会神职人员担任。圣公会也因此得到港府较多的支持，该会圣约翰堂的兴建就得到政府 4600 英镑拨款。^[3] 另外，华人基督徒被香港政府视为高等华人，并且在许多领域享受特殊待遇。这种把是否为基督徒作为区分华人优劣标准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对传教事业的推动之功。

4.1.2 社会基础相对广泛

基督新教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而传入近代中国，再加上明末清初“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条约开教后的新教并未能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内陆建立广泛、牢固的社会基础。尽管和鸦片战争以前比，战后的新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其所遭遇的阻力和挫折足以表明其社会基础的薄弱性。据统计，自 1860 年至 1899 年间，各地发生教案共计 811 宗，堪称民教冲突此起彼伏。^[4] 这些教案“骚乱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一，从日常向基督徒家庭的房屋扔石头或骚扰一群过路的传教士，到损毁贵重财产和杀伤人命等都有。”^[5] 香港基督新教发展过程中，虽也存在局部的抵制传教活动、驱逐和迫害传教士的情况，但没有酿成教案悲剧，整体上保持了民教之间较为和谐的关系。

信仰者人数的发展变化也是衡量宗教社会基础的一项重要标准。由于近代香港隶属于英国统治，又历经 97 政权回归，大量档案资料在国内没有保存，此外，二战中大部分教

[1] 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2）》，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 年 12 月版，第 3 页。

[2] 余伟雄主编：《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印，1987 年，第 201 页。

[3] 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1842 至 1866 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中国神学院，2003 年 1 月版，第 148 页。

[4] 陈银崑：《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 1860-1899》，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 13 页。

[5] [美]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 614 页。

会资料被战火淹没，有关近代香港地区基督教徒难得确切的统计数目。但从某些教会信徒的发展变化可略窥香港基督新教之全豹。

1843年理雅各由马六甲迁入香港，而他带同的几位信徒构成了伦敦会当时在港华人信徒的全部。理雅各不断地宣讲教义、招收信徒，至1860年，不计儿童，他的总受洗人数已有119人，至1870年总受洗人数已有272人。当中经常聚会的应不少于39人。^[1] 马礼逊入华7年才有一位中国人接受其洗礼，在华传教25年广州仅有10位华人信徒。显然，新教在既存文化传统和社会力量较弱的香港比中国大陆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据统计，1880年时的香港人口为16万，华人基督徒有800多人。^[2] 除日占期间信徒人数曾一度急剧下降外，香港的新教信徒人数基本上保持着上升趋势，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大量内地人口的涌入曾使教会获得快速的发展机会，信徒人数倍增。据香港基督教联合会统计，日占前香港教会人数已增至18000多人。^[3] 日占前的信徒人数基本能反映近代香港的发展状况，某种程度说明了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4.1.3 信徒社会阶层偏高

就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而言，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较突出的特征，那就是近代以来信奉基督新教的中国民众，大都来自于下层社会，这种情况直到1900年都没有改变。香港基督新教在社会中上阶层群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割让以前的香港是一个荒芜小岛，人口以流动人口、渔民为主，故和中国内地一样，传教士最先也是在乡村传教，所接收的信徒也多是社会下层的民众。但随着太平天国的爆发和殖民政府各项建设的开展，沿海城市的大批商人避乱至港，一些不容于清廷的知识分子、曾受佣洋人的技术人员也因谋生而蜂涌入港，从而使香港城市人口急速增长。这就给城市传教带来了更多机遇，许多西方差会很快便放弃了在乡村建立教会的努力，转而将重点放在城市的商业人士和专业阶层。因此，香港第一代华人教会的信徒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

中国伦敦会华人教会纪念册记载了1866年及以前加入教会的60多位男性信徒的职业。60多位男信徒的职业大致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受雇于教会的人士，共18人，其中曾为宣教师、教会学校教师、送书员、印刷工人等专门技术人员的有12名，其余为

^[1] 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1842-1866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中国神学院，2003年1月版，第128页。

^[2]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3]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1月增订版，第170页。

教堂杂役、看更等；第二类是城市的文职、商业及专业人士，共 17 人，其中教师最多，个别还是政府学校的教师，有几位是买办，还有一些政府的文职人员；第三类是技术及操作人员，共 15 人。第四类是乡村生活者，包括渔夫、牧洋人等，共 5 人。^[1] 从以上可见，第一类和第二类信徒均有固定职业和收入，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应属于中上阶层，几占教会信徒的三分之二；第三类中可能有苦力，可能也有一些中等收入的主管或老板；人数最少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下层群众。

香港基督新教的这种传播特色，随着教会各项社会事业的开展和香港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1）早期入教会学校的贫苦学生，凭借其所接受的先进教育，或为买办、或为翻译、或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提升，如第一位华人陪审员黄胜、最早的华人立法局职员伍廷芳、何启等，都是社会中上层华人，也是忠实的基督教信徒。（2）出现了信仰基督新教的世家大族。一批海外移居回港的富有家族不仅带回了巨大的资产和新的商业原则，还带回了家族的基督教信仰。如先施、永安、大新公司的郭、马、杜、蔡氏家族都信仰基督新教。和中国大陆相比，这些中上等华人信徒和基督新教世家大族构成了香港教会的社会支撑点之一。

4.2 社会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2] 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反过来，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督新教适当地顺应了近代香港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一系列社会文化活动，从而达到宗教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对近代香港乃至全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4.2.1 推动近代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政府并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教育政策，而是沿用英国的教育传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宗教团体和私人办学，政府只是对学校予以少许补助。基督新教传教士自抵港后就致力于教会学校的创办，部分教会人士还参与了香港教育体制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推动了香港的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发展。

教会学校是近代香港最早的西式学校，引进了近代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

^[1] 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1842-1866 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中国神学院，2003 年 1 月版，第 130-131 页。

^[2]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6 月版，第 161 页。

教会开办学校的主要动机是宣教，通过扩大新教的势力和影响拓展传教渠道，但教会学校对近代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推动了香港教育的发展。

教会学校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其办学模式源于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传统书院、私塾相比较，香港教会学校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一）从教育对象来看，传教士给予社会各阶层的人以均等受教育的权利，如迁港后的马礼逊学校的学生，除有一部分买办和通事子弟外，大多来自贫寒之家。该学堂还对贫困学生一律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一些衣物。另外，教会学校还一改传统书塾只招收男性的习惯，开始招收女生。1844年落成开学的“宏艺书塾”就招收有20名男生，6名女生，以中英文双语教学。^[1] 随后，各新教差会纷纷创办女学，构成香港早期教育的一大特色。（二）从教育内容来看，教会学校开设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马礼逊学校1842-1846年间开设的课程就有英语、地理、历史、代数、算术、几何、力学、声乐等，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小学的基本课程。^[2] 香港教会学校还注意将教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实利主义的取向，香港教会学校都十分重视英语学习。如马礼逊学校除开设英语阅读、写作和英文书写等课程外，还采用英语教学，使学生在英语听、说、写等能力获得提高。（三）就教育目标而言，教会学校主张近代意义上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英华书院校长布朗就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训练，包括体能、智力和道德”^[3]。（四）教学方法上，香港教会学校采用的是一套比较符合知识接受规律的近代教育方法，即对学生进行分班、分科和分级教学，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圣保罗男书院的编制分高中初三级，共分十四班，总计八学年。^[4] 拔萃中学还设有一所理化实验室，使学生能在实际操作中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教会学校这些先进特征，对香港华人自办新式学堂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尽管教会学校代表近代先进教育的方向，但由于经费不足和宗教教育限制等原因，其办学规模和效果并不理想；传统教育则因与社会现实和教育发展趋势脱节而日益式微。教会人士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促成了香港世俗教育体制的建立。

（一）郭士立等传教士提出的补助计划是建立世俗教育体制的肇端。据记载，早在1843年8月就有一位传教士向香港政府建议设立学校委员会对当地的私塾加以管理。^[5] 1845年传教士郭士立在写给总督的一封信中，正式提出对维多利亚、黄泥涌等地的8所传统书

[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503.

[2] 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51-352页。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70.

[4]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月增订版，第195页。

[5]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440-441.

塾给予补助的建议。^[1] 1847年11月,香港总督任命总巡理府希利尔、牧师史丹顿、华民政务司英格利斯组成专门委员会,调查维多利亚城、赤柱及香港仔的中文学校的情况,以便采取措施鼓励此三处地方各有一所学校置于政府的管理下。次年2月,政府正式任命了所选定的三所学校的教师,并给予每所学校每月10美元的补助。政府给予中文学塾以补助,标志着香港教育体制的开端。这些接受补助的学校被称为官立学校(Government School, 当时译为“皇仁书馆”)。

(二) 理雅各的教育革新计划是香港教育体制建立的直接动因。理雅各早年也是一位热心宗教教育的传教士,但教会学校培养本地传教士的失败尝试,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理解的加深,使他逐渐成为香港教育改革的鼓吹者。他主张开展世俗教育,官立学校的管理和内容都与教会分离,从而使教育从教会的束缚中转变过来。1860年1月港督罗便臣将教育委员会改组为“教育局”,理雅各成为委员会的实权人物,7月他提出了教育革新计划,成为香港教育世俗化的重要步骤。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维多利亚城修建校舍一座,将分散在太平山等地的几所学校集中在该处。2、由一名欧籍教师组织和管管理英语班。3、由该欧籍教师负责管理香港仔及全岛其他农村学校。^[2] 概括来说,该计划建议政府将所有的官立学校合并为一所中央书院,聘请一位欧籍人士出任掌管,提高教育素质,实行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分家。1861年1月9日,港督正式批准并开始实行教育改革计划。1862年2月,四所官立学校合并成立为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 1889年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 Victoria College, 1894年改名为“皇仁书院” Queens college 并沿用至今)。校长史钊域除管理书院事务外,还兼顾对其他政府书馆的监督工作。因此,中央书院的建立标志着香港世俗教育体制建立,香港教育的世俗化、体制化在教会人士的推动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865年理雅各向提议将政府将教育局扩大为“教育司”,专门负责香港教育工作。6月24日,政府正式任命史钊域为教育司的司长,直接向港督负责,中央书院及其他政府书馆均由他统辖。至此,香港的教育事业从教会势力的掌控下转变过来,正式拥有了独立的教育机构;香港系统的教育改革也因而在史钊域的引领下展开新的面貌。

19世纪后期以来,大批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教育传教士进入香港,他们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向香港传输西方的教育思想,在推动香港教育近代化的同时,使香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前沿阵地和了解近代西方教育的重要窗口。

[1]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5-26.

[2] 计划全文见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5-187.

4.2.2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因而宗教的传播往往成为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进入近代后，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广传福音，往往采取各种文化手段辅助传教，从而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香港开埠后逐渐成为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首先，驻港传教士在汉语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脚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着了先鞭。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所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 13 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1] 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辞汇。除文章第三章已经提到的几部享有国际威望的书籍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 年）、《粤语通易》（1883 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 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 年）、《怎样讲粤语》（1889 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 年）、《新会方言》（1890 年）和《东莞方言》（1890 年）等书。这些书籍都力求使汉语简单化和通俗化，极大地减轻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难度。有些作者还“竭力搜集有关的中国人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的新鲜有趣的资料，作为读物，使学生不但可以熟识语言，而且也能了解他们切望在其中侨居的人民的日常生活”。^[2]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西方人与华人的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 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 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 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1]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年 11 月版，第 52 页。

^[2]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年 11 月版，第 56 页。

其次，在港教会或教会人士为中国输入了大量西方文化。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还在港出版各种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重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1] 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

^[1] 转引自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8页。

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教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共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该院教师大部分是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外籍教师,拥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书院采用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均在门诊室或病室负外科医生的助手及司药助手的责任”^[1]。因此,该校毕业的学生不仅具备较系统的医学知识,还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2]。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李鸿章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第三,基督新教在香港的传播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采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地收集、研读、考证、分析经文,做到既借鉴各经学门派的成果而又不枚守前人结论,精确地阐释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从而使《中国经典》成为至今为止西方汉学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近代汉学家小翟理斯曾经说:“五十年来,使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谢理雅各氏不朽之工作也。”^[3]对理雅各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理雅各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1876年他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1880年受英国长老会的邀请,理雅各在伦敦乔尔福街

^[1]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140页。

^[2] 转引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59-260页。

^[3] 刘蜀永:《香港历史杂谈》,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67页。

长老会书院进行了题为《中国之宗教—基孔道平心比评》的演讲，不久，该演讲作为专书得以出版。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从以上几点可知，不管是从奠定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方面，还是从输入西方文化或输出中国文化方面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4.2.3 影响中国部分先进人物思想的发展

中国近代部分先进人物与香港均有密切联系。他们或早年在港接受西方教育，或与在港传教士有密切交往，其思想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基督新教的影响。笔者以洪仁玕和孙中山两位不同性质的起义领袖为例，来分析香港基督新教对中国近代部分先进人物的影响。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领袖之一，但他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认识远远超出洪秀全等其他领导人，尤其是他的《资政新篇》因触及时代主题而在思想领域熠熠生辉。洪仁玕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与他长期在香港和基督新教传教士的频繁接触密不可分。

洪仁玕是拜上帝会早期信徒之一，金田起义后因躲避清廷的缉捕而逃至香港，并经新教教徒洪新介绍为传教士韩山文所收留，不久因韩转赴广东传教而一度返东莞谋生。1853年洪仁玕再次投靠返港的韩山文，“声言愿将各事交托上帝”^[1]，并于9月在香港伦敦会所受洗入教。1855年至1858年，他一直受雇于伦敦会，担任解经者和传道牧师达四年之久。在港期间，洪仁玕一面“研究圣经”，一面“授书夷牧”^[2]，广泛接触了寓港西人，尤其是

^[1] 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78页。

^[2] 韩山文著，简又文译：《洪仁玕自述》，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46页。

与新教传教士交往密切。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法法类”中曾提及与之交游的 23 名西人中，除米士威为政府官员外，其他均为传教士，且大部分居住在香港，其中理雅各、合信、裨治文等还撰写过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和风土人情的中文著作，是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人物。

香港新教传教士不仅直接为洪仁玕提供了西方知识，而且还为他提供了教职，使他能长期在港阅读教会书籍、期刊和目睹英国的各类市政建设以及教会开创的各种社会事业。这种与西方文化近距离的接触使洪仁玕提高了对“西艺”、“西政”的认识，从而实现由传统知识分子到改良思想家的转变。同时，基督教思想在洪仁玕的政治改革方案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作为一位虔诚基督教徒，洪仁玕深信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弊病根源在于“习俗迷人”，而他所谓的“习俗”不外是儒、佛、道三教。在他看来，“释、聘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教上担当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1] 即他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启迪人心，给人智慧。他甚至将西方的强盛归结到对基督和上帝的信奉上。尽管洪仁玕抱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愿望并不正确，也无法实现，但他却因信仰而注意到基督教和儒教的区别，从而把对西方的学习引到了制度和精神层面，就这点来说，香港基督新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有学者在论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渊源时曾指出，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产生于香港的求学经历，产生于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2] 而孙中山早年主要就读于香港教会学校或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学校，期间他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密切接触了香港基督教会。因此，香港基督新教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兴趣，最初产生于他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就读期间。这两所学校都以宗教教育为主，学生早晚和星期天都要到教堂做祈祷。耳濡目染之下，孙中山不仅掌握了广博的宗教知识，还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83 年孙中山转至香港拔萃书院学习，并通过伦敦会长老区凤墀结识了喜嘉理牧师。喜牧“知其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水礼，遂力劝其早日受礼奉教，以为众倡”^[3]。同年年底，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起，由喜嘉理牧师在纲纪慎会礼拜堂施洗加入基督教，取号日新。孙中山入教后，十分热心参加各种宗教活动。1884 年他曾与喜嘉理等人一道回家乡布道，经他劝导，“其友二人，

[1] 《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 5-6 页。

[2] 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1 月版，第 153 页。

[3]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 年 11 月增订版，第 296 页。

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1]。1884年孙中山入中央书院学习，该院虽为政府学校，但香港圣公会主教施美夫和伦敦会理雅各都是该校的创办人，英文课仍采用圣经为课本。期间他与王煜初等牧师有密切往来。1887至1892年孙中山于香港西医书院就读。该书院的掌院史剑域、教务长孟生、康德黎、名誉秘书何启、秘书谭臣以及其他医学教师，均是教会的热心分子。其时，孙中山还常到临近的道济会堂与该堂主任牧师王煜初讨论有关神学问题，依然深受基督教的熏陶。喜嘉理在回忆孙中山当时的宗教信仰时说：“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也，向使当日香港及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迨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2]此足可见证当时孙中山对基督新教的笃信程度。

基督新教作为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其教义中蕴涵着自由、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精神。孙中山正是从基督新教中获得了可资利用的素材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

第一、基督新教的救世思想是孙中山立志反清救国和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思想动因之一。在他眼里，耶稣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的革命家。他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人，其牺牲小我、谋求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3]。他甚至将自己救国救民的心志等同于耶稣救世的宗旨，他曾多次表示他和耶稣一样，都是革命家，“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的”^[4]。

第二、孙中山吸取了基督新教教义中的博爱、平等观念。他认为“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5]，基督以牺牲自己为主义，普救众生，这和革命者救世救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样的。他还指出“博爱”中的道理和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6]。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也受到了基督教“平等”观念的影响。他认为“信基督为革命家，及为划除一切不平等者”^[7]。当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欧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思想，基督新教的平等、博爱观念只是在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发酵的作用。

第三、香港基督徒积极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孙中山开创革命新局面时，部分基督新教的牧师、教徒或成为他的革命伙伴，或作为他的朋友，从许多方面支持和帮助他开展革命活动。如教徒杨衢云、谢纘泰、陈少白、郑士良、

[1]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1月增订版，第299页。

[2] 刘粤声：《香港基督教教会史》，香港浸信教会，1997年11月增订版，第300页。

[3] 转引自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第17页。

[4] 转引自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第8页。

[5] 《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6] 《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0页。

[7] 《孙中山耶教观之追记》，载《申报》，1925年3月28日。

区凤墀等积极参与建立香港兴中会的工作，并成为其领导骨干。又如李昌是香港救恩堂的早期教友，后任檀香山政府秘书，他与另一位客属侨胞何宽大力支持协助兴中会组建工作，并积极介绍侨胞参加兴中会。^[1] 孙中山遇到的许多问题也都借李昌政府要职的特殊身份而迎刃而解。一部分教友还率先创办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扩大革命影响。陈少白创办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崔通约、邓干隆分别在香港《世界公益报》和旧金山《大同日报》担任重要工作。香港循道会的李煜堂还在《中国日报》遭保皇党人破坏致有停刊之危时，拨款承购该报，并支持该报经费多年，直到辛亥革命胜利。^[2]

就基督新教对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孙中山深有体会。他曾公开承认“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3]。又说：“予深信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教徒者实多。”^[4] 尽管随着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孙中山对基督教神学理论产生过怀疑，但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基督教信仰，临终前夕还在病榻上曾对亲友说，自己“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人间罪恶之魔宣战”^[5]，足见其所受基督新教影响之深刻。

香港基督新教对孙中山革命活动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即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但最重要的是，新教对孙中山平易近人、沉静博大的品格和舍己救人的精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康德黎所评价的一样：“他（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苦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6]

可见，以洪仁玕、孙中山为代表的部分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过程受香港基督新教的影响较大。他们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基督新教也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而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1] 余伟雄主编：《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印，1987年，第64页。

^[2] 梁图光：《有关孙中山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资料》，载《天风》，1986年第10期。

^[3]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6-447页。

^[4] 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66页。

^[5] 转引自董丛林：《孙中山宗教观的近代政治、文化蕴涵述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6] 转引自郭秀文：《略论洪秀全、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之异同》，载《学术交流》，1999年第4期。

结 语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外关系的新的转折，也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新的开端。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新教传教士不断获取在华传教的种种特权，纷纷从各口岸城市转赴内地活动。基督新教正是在这种中外关系变动的社会大环境下传入香港，并受中国内地社会变迁的影响而逐步得以传播和发展。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繁荣发达的港口贸易经济，使殖民地香港逐渐成为了基督新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后勤基地和集散地。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是一种外来宗教对以华人为人口主体的殖民地环境的适应过程。地窄人稀的香港并非来华传教士首选的理想传教据点，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发展经历了西方差会、华人教会、困难与复兴三个重要的阶段。开埠初期，西方传教士只是视香港为进入内地传教的跳板和人才训练基地，并无意在本地华人之间拓展传教事业。为数不多的华人信徒主要依附于专门为西方人设立的教堂内聚会，华人传教士极少且多被派往内地工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香港华人的社会地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华人信徒的自主、自立意识不断增强。教会中的一批华人知识分子开始主动筹措资金兴建教堂、招聘主任牧师、组建华人教会组织。在中国大陆非基督教运动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华人教会基本上改变了完全被西方传教士掌控的局面，实现了自养、自理。与此同时，为扩展传教事业，华人教会之间加强了交流与合作，建立了香港基督教联合会等联合组织。日本占领香港后，香港教会发展曾一度受挫，出现短暂的困难时期，但随着英国对香港统治政权的恢复，基督新教很快得以复兴，并为其后的繁荣奠定基础。

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香港华人教会和信徒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中国大陆的关注和关怀，如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体现了与祖国血脉相连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教育活动是香港基督新教社会活动的一大亮点。一方面，教会学校是近代香港最早的西式学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同时也为香港和中国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还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华人自办学校提供了可鉴之资；另一方面，教会人士积极参与香港教育体制的建立，客观上推动了香港教育制度的近代化过程。

宗教传播的过程本质上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吸纳的过程。因此，宗教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进入近代后，西方传教士多主张在传教的

同时辅之以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在华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点上，香港基督新教也取得重大成果。在港传教士通过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出版书籍、设立医疗机构等等方式，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此同时，他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并通过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典籍或返国开展学术讲座等活动把中国学术文化传向西方，从而奠定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香港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

中国近代的部分先进人物，或通过早期在香港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或通过在与在港传教士的密切接触，其思想发展过程受香港基督新教的影响较大。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基督新教也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综观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的传播过程，可以发现，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香港并非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的中心城市，也非西方传教士刻意经营的传教点，而只是他们藉以进入中国的“踏脚石”和躲避灾难的“避难所”。但历史却又使近代中国的这一区域具备了一些有利于基督新教发展的因素。和中国内地城市相比较，近代香港拥有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基督新教在香港传播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来自官方和民间的阻力都较小，因而发展相对比较顺利，对香港和中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较明显和深刻。近代香港的发展与基督新教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基督新教在香港积极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具有开创性意义，客观上推动了近代香港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参 考 文 献

一、文献资料

- [1] [清]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M]. 赵春晨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 [清]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3] 王铁涯主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一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4] 广东文史资料[M]. 第44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5] 李楚材编著.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 [6]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辑. 太平天国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7] 洪仁玕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8] 陈旭麓主编. 孙中山集外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9] 孙中山全集[M]. (第二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M]. (二)、(六), 北京: 神州国光社, 1953.
- [11] 王元深. 圣道东来考[M]. 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07.
- [12] 麦梦生. 反对蓄婢史略[M]. 香港: 福兴中西印务局, 1933.
- [13] 香港历史资料文集[C]. 香港: 香港市政局, 1990.
- [14] 梁图光. 有关孙中山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资料[J]. 载《天风》, 1986年第10期.
- [15] 香港公理堂五十周年纪念刊[C]. 香港: 香港公理堂, 1934.
- [16]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九十五周年会庆特刊[C]. 香港: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996.
- [17]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百周年会庆特刊[C]. 香港: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2001.
- [18]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150周年纪念特刊[C]. 香港: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 1998.
- [19] 余伟雄主编. 香港崇真会立会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847-1987)[C]. 香港: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编印, 1987.
- [20]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九十周年会庆特刊[C]. 香港: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991.
- [21] 圣公会港澳教区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C]. 香港: 圣公会一三五周年庆典出版小组委员会, 1984.
- [22] 香港浸信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C]. 香港: 香港浸信教会, 1961.

[23] 香港崇真会救恩堂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特刊[C]. 香港: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救恩堂, 1977.

[24] 孙中山耶教观之追忆[N]. 载《申报》, 1925年3月8日.

二、中文论著

(1) 大陆方面:

[1]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3]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5] 吴义雄. 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6] 黄新宪.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7] 史静寰、王立新.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8]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9] 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10] 李桂玲编著. 台港澳宗教概况[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11]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M].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1938.

[12] 刘蜀永. 香港历史杂谈[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13] 宗教工作基础知识[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1.

[14] 沈福伟. 西方文化与中国[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5] 林家宥.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16] 钟紫主编. 香港报业春秋[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17] 戴康生、彭耀主编. 宗教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8] [美]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M](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9] [新加坡]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0] 陈听、郭志坤. 香港全纪录[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1] 陈昌凤. 香港报业纵横[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22] 于可. 当代基督新教[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23] 余绳武、刘存宽. 十九世纪的香港[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4] 顾明远、杜祖贻主编. 香港教育的过去和未来[M]. 北京: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25] [美]沃尔克著, 孙善玲、段琦等译. 基督教会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 港台方面:

[1] 刘粤声. 香港基督教教会史[M]. 香港: 香港浸信教会出版部, 1997.

[2] 刘粤声. 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M]. 香港: 香港浸信教会出版部, 1997.

[3] 刘瑞滔. 港粤澳名牧生平[M] (第一集), 香港: 香港基督教送书会, 1957.

[4] 罗彦彬汇集. 礼贤会在华传教史(1847—1947) [M]. 香港: 礼贤会香港区会, 1968.

[5] 杨森富. 中国基督教史[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68.

[6] 查时杰主编. 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M]. 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83.

[7] 李志刚.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5.

[8] 李志刚. 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M]. 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87.

[9] 李志刚. 香港教会掌故[M]. 香港: 三联书店, 1992.

[10] 汤清.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M]. 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87.

[11]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M]. 台湾: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3.

[12] 梁家麟. 华人宣道会百年史[M].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8.

[13] 梁家麟. 广东基督教教育(1807-1953) [M]. 香港: 建道神学院, 1993.

[14] 梁家麟. 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M]. 香港: 天道出版社, 1999.

[15] 吴梓明. 香港教会办学初探[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8.

[16] 王乐齐. 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M]. 香港: 波文书局, 1983.

[17] 方美贤. 香港早期教育发展史[M]. 香港: 中国学社, 1975.

[18] 罗香林. 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61.

[19] 王赓武主编. 香港史新编[M] (上、下册), 香港: 三联书店, 1997.

[20] 黄玉梅. 川流不息[M]. 香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77.

[21] 徐松石编. 华人浸信会史录[M]. 第一辑(大陆地区)、第二辑(港澳地区), 香港: 香港浸信会出版部, 1972.

[22] 蔡儿. 香港名校巡礼[M]. 香港: 周刊出版社, 1986.

[23] 吴利明.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M]. 香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1.

[24] 霍启昌. 香港与近代中国[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2.

- [25] 刘绍麟. 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 1842-1866 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M]. 香港: 中国神学院, 2003.
- [26] 陈银崑. 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 1860-1899[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91.
- [27] 李金强. 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 (1901-2002)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02.
- [28] 阮柔. 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M]. 香港: 进步教育出版社, 1948.
- [29] 卢锦华. 香港基督教社会工作初探[M]. 香港: 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 2002.
- [30] 吴立乐. 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M]. 香港浸信会出版部, 1970 年重印本.
- [31] 施其乐著、宋鸿耀译. 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M]. 香港: 教育图书公司, 1999.

三、英文论著

- [1]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M], New York. 1929.
- [2] D.Willis James, Professor of Missions and Oriental History in Yale University[M],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32.
- [3]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5] Pawl A.Varg ,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M], New York, 1977.
- [6] E.J.Eitel: Europe in China[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7]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 [8] D.Mac 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M].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1890.
- [9]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0] E.J.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Z], China Review, Vol.19,

四、期刊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

Ching Feng (《景风》)

五、论文、论文集

- [1] 林治平.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文化论文集[C].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70.
- [2] 林治平. 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C].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84.
- [3] 李志刚.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C] (一),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89.
- [4] 李志刚.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C] (二),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93.
- [5] 李志刚.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C] (三), 台北: 宇宙光出版社, 1997.
- [6] 罗秉祥、赵敦华主编. 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7] 何兆武.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C].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 [8] 卓新平、萨耶尔主编. 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 [9] 谭树林. 英华书院: 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J]. 聊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 2.
- [10]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期刊[J]. 世界宗教研究(京), 2002. 2.
- [11] 陈建明.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J]. 宗教学研究(成都), 2002. 2.
- [12] 何修文. 香港的宗教团体及其政治倾向[J]. 东南亚研究(广州), 1999. 3.
- [13] 雷雨田.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J]. 广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 3.
- [14] 赵红宇. 香港宗教的传播与发展[J]. 世界宗教研究(京), 1997. 2.
- [15] 夏明方. 论 1876 年至 1879 年间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J]. 清史研究(京), 1997. 2.
- [16] 钱英. 十九世纪香港教育的世俗化与中西文化交流[J].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1.
- [17] 宋新. 理雅各—从传教士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1997. 2.
- [18] 郭秀文. 略论洪秀全、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之异同[J]. 学术交流, 1999. 4.
- [19] 宋德华.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4.
- [20] 邹振环. 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01]. 《王韬洋教观述论》，《大学现代教育》，2003 年第三辑。

[02]. 《从〈弢园文录外编〉看王韬的西洋观》，《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致 谢

本篇论文能够顺利完成，首先十分感谢我的导师雷雨田教授。三年来，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恩师都给予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指导。本论文从选题、收集资料、写作、修改到最终定稿，都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导师的不倦教诲，时常警醒我心灵深处的自珍自重，激励我不断地追求上升和进步之路，将使我受益终生。

感谢人文学院的何大进教授、吴晟教授、冷东教授、赵春晨教授、霍俊江教授、高路加教授、陈永祥教授、何薇副教授、郭华清副教授，历史系资料室的王广平老师、研究生处的领导和老师们以及历史系已故的刘汉东教授，他们在工作和授课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教益和启发，尤其是历史系的老师们对本论文给予了耐心地指导和帮助。

感谢学友陈享冬同学，他在本论文资料收集和写作的过程当中，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不厌其烦地帮我校对文稿。另外，感谢学友孙颖、程慧超、陆耿、于军、王发志、张玉鹏、倪娜、邓颖琪等，他们在三年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都给予了我许多关心和帮助，为我营造了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生李铁。本论文所采用的大量有关香港教会的堂会史、期刊、纪念特刊等资料，全部是由李师兄从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复印并邮寄过来的，他所提供的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原始资料的不足，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

感谢我的家人和亲友，是他们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才使我能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真诚地祝愿所有关心我的人健康、如意！

由于才疏学浅，论文必定有许多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夏 玲

二零零五年五月